



青年自学丛书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青年自学丛书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

(征求意见稿)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598.05
71281

青年自学丛书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
(征求意见稿)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28,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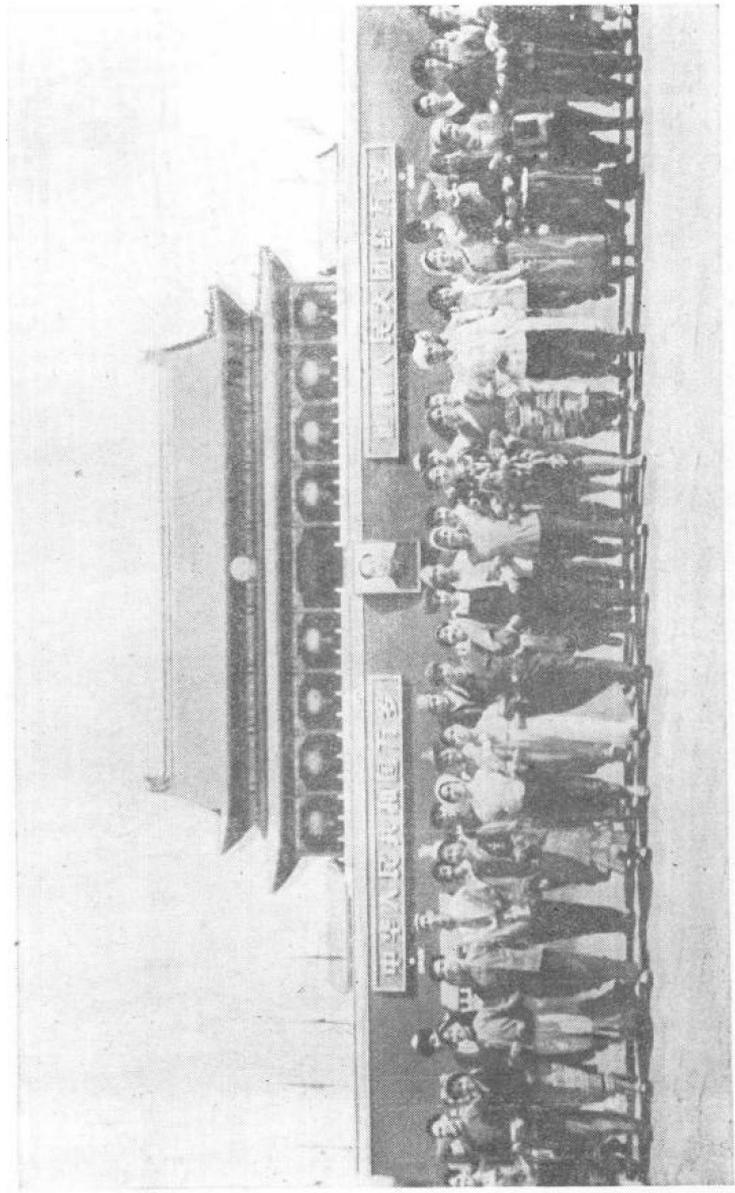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3171·264 定价: 0.33元

内部发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民族團結起來

毛澤東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1
第一节 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	1
第二节 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	16
第三节 少数民族人民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	25
第四节 少数民族人民的英勇斗争	37
第二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	51
第一节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52
第二节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56
第三节 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66
第四节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世界观	69
第三章 党的民族政策	75
第一节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75
第二节 继续贯彻民族区域自治	82
第三节 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91
第四节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98
第五节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12
第六节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118
第七节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24
第八节 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中的宗教信仰	129
第九节 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爱国人士	138

第四章	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141
第一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群众运动广泛开展	141
第二节	文化教育战线取得巨大成绩	148
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148
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		152
合作医疗日益巩固 赤脚医生遍及村寨		155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158
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展开		159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欣欣向荣	161
大寨花开 山村巨变		161
草原换装 六畜兴旺		165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169
工业发展 交通发达		171
商业繁荣 市场兴旺		179
第五章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184
后 记		191

第一章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第一节 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一共有五十五个民族。汉族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所以习惯上就把汉族以外的五十四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

我国五十四个少数民族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难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崩龙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普米族、门巴族、珞巴族。除了上面所列的五十四个少数民族，在我国云南省境内还有人口很少的基诺人和苦聪人。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又有僜人。

解放前，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因支系、方言或聚居地区的

不同,同一个民族内部,往往又有好几种不同的自称。例如佤族就因聚居地区的不同,分别有“巴饶克”、“阿瓦”、“拉弗”等多种自称;哈尼族因支系区分,又分别有“卡多”、“毫尼”、“爱尼”等好几种自称;彝族因方言上的差异,本民族内部各种不同自称更多。解放后,经过党和政府对全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在慎重地进行了民族的识别工作后,并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最后才正式确定了上述五十四个少数民族。

在我国五十四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十个民族。他们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其中壮族是我国所有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根据一九五七年国家的统计,就有七百七十多万人。少数民族中,人口在十万以上的,有十七个民族,他们是: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萨克族、哈尼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除此而外,其余各个少数民族人口都比较少,其中人口最少的是赫哲族。解放初期,这个民族的总人口只三百多人,现在已增长到约为七百人左右。但是,民族不论大小,包括汉族在内,我国五十五个民族,都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我国少数民族在全国近八亿人口中,虽然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少数民族的分布面积却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我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是一种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局面。

汉族,从我国整个历史来看,还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遍布全国,即如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历来比较集中居住的地区,也



汉 族

都长期居住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居民。很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族居民还超过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另一方面，在我国其他各个省、市中，长期以来也都或多或少地聚居或散居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江西省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少数民族分布最少的地区，全省也长期散居有畚族、回族的人民数千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县、市，长期都居住有两个以上民族的人民。

我国少数民族除了与汉族这种插花式的杂居外，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也有很多是相互交叉杂居的。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就长期居住有十三个民族的人民。除了维吾尔族和汉族，还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锡伯、塔塔尔、达斡尔、满等十一个民族的人民。广西壮族自治区，除了壮、汉两族人民外，也还长期居住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京、彝、水、仡佬等许多个民族的人民。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仅一个州，就居住有包括傣、汉两族在内的十个以上民族的人民。

除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这种大杂居，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在祖国各地，长期以来，一般又都各有一个、甚至好几个大小不等的聚居地区。

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里，由于各民族人民的长期友好交往，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聚居程度，也都并不十分集中。例如，回族在解放初期的总人口是三百五十多万，但当时聚居在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却只有六十多万，因此，除了宁夏，现在在全国其他省、自治区，又有好几个地区有回族的自治州和自治县。彝族，按解放初的统计，它的总人口是三百二十

多万,但当时聚居在现在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的,也只有八十多万,其余绝大部分都分别聚居于凉山以外的四川省其他地区和云南、贵州两省境内。藏族,解放初的总人口是二百七十多万,但据当时统计,聚居在西藏境内的,也不过一百二十万,其余半数以上,历来就分别聚居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因此,总的说来,我国各民族的分布,就是这样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

我国各民族的这种分布状况及其形成的过程,是我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从今天我国民族的分布状况来看,也有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结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因此,一百多年来,尽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一小撮反动分子,一直千方百计挑拨、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团结,妄图分裂我们伟大的、统一的祖国,但是他们的所有这些阴谋诡计,过去没有得逞,今后也永远不会得逞!

除了大杂居,小聚居以外,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些主要聚居区,大部分都分布在我国边疆地区。例如,祖国的北部,有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位于新疆与宁夏之间的甘肃省,全省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面积是少数民族的分布区。祖国的西南,有西藏自治区。南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介于广西与西藏之间的云南省,又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共聚居有二十二个民族和基诺人、苦聪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分布面积占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全省没有一个县、市的居民是单一民族。此外,在祖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两

省，也都有不少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如黑龙江境内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小兴安岭林区，就有蒙古族和鄂伦春族等聚居区；在吉林省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毗邻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的主要聚居区。处在祖国南部、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岛，有黎族和苗族的聚居区，在台湾省，有高山族的聚居区。

长期以来，尤其是解放后的二十多年来，居住在祖国漫长边疆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为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以及不断巩固祖国国防等等方面，都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积极支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牧业生产，对于进一步巩固祖国国防，防止帝、修、反的入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语言的种类很多，一部分少数民族有本民族比较通用的文字，但有的少数民族历来通用汉文、汉语。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于世。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广阔，河山壮丽，物产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些都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

在西藏自治区，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平均海拔约四千米左右，著名的珠穆朗玛峰即位于我国和尼泊尔的边界上。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上游又称马泉河），是我国著名大河之一。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市，是全国闻名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

西藏的主要农作物，是耐寒耐旱、生长期较短的青稞，它是藏族人民的主要食粮。藏南谷地，历来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藏北，主要是牧业区。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和藏东谷地南部，还出产甘蔗、葡萄、柑橘、香蕉等水果。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及山南地区、东部峡谷都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西藏出产的主要药材有贝母、虫草、麝香、全蝎和硼砂等等。在众多的高原湖泊中，还有丰富的鱼产。

西藏的天然牧场占整个自治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高山上的冰雪，又是大可利用的充足水源。但解放前在黑暗的农奴制统治下，农业耕作粗放，产量很低；牧区牲畜都是“秋肥、冬瘦、春死亡”。这种状况，直到解放以后，才逐渐得到了改变。

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面积达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新疆边境多山，盆地广大。中部横亘天山山脉，现在我们所说的南疆、北疆，即以天山为界，而哈密、吐鲁番盆地一带，又称东疆。新疆的河流很多，其中最大的塔里木河，全长二千一百七十多公里，是我国最长的内流河。当地各族人民从事农、牧业已有悠久的历史。农业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甜菜等，有些地区也种稻米、高粱。新疆还是我国长绒棉的重要生产基地。因为新疆还出产多种著名水果，故向有“水果之乡”之称。特别是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伊宁的苹果、库车的杏干、喀什的樱桃、阿图什的无花果和阿克苏的薄皮核桃，更是名闻中外的特产。新疆有很多广阔的四季牧场，因此历来是我国主要牧业基地之一。历史上，当地的库车羔皮羊和原产巩乃斯的细

毛羊驰名全国。伊犁马和巴里坤马早在汉代就颇负盛名。

新疆也有不少原始森林。好多河流湖泊都有丰富的鱼类。新疆的中草药品种也很多，比较有名的是甘草、党参、红花与雪莲等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公元前本是一片丰茂的草原，乌鲁木齐（意即“优美的牧场”）就是因此得名的。南疆的喀什市，是我国古代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的要站；和田县，在历史上即以盛产丝绸、玉器 and 地毯闻名。一九四四年开始的三区革命的中心伊宁，是我国西北部边疆的著名古城。而位于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则是解放后在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新型城镇，有“戈壁上的明珠”的佳称。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它的首府呼和浩特，意即“青色之城”。

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基本上是海拔千米左右的广阔高原。高原牧草肥美，草原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良天然牧场之一。其中锡林郭勒盟（“盟”相当于地区）和乌兰察布盟，是全区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牲畜中以绵羊、山羊为最多，也有牛、马、骆驼。内蒙古的乌珠穆沁马、乌珠穆沁牛，早就以品种优良而闻名。

内蒙古的农业区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与阴山山脉之间的河套平原。还在很早以前，就有“塞上谷仓”之说。内蒙古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莜麦、糜子、马铃薯；经济作物以胡麻为主。解放后又试种甜菜成功，是我国现在重要的甜菜基地之一。

在内蒙古阴山山脉和伊克昭盟的东南部，介于农、牧区之



蒙古族

间,还有一条狭窄的半农半牧地带,那里乳用、肉用养畜业和耕畜业比较发达。

内蒙古还有不少行销中外的著名药材,如:麝香、青羊血、牛黄、大蓉、甘草、麻黄、川地龙等等,资源十分丰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秦代属于桂林郡,所以现在还简称“桂”。它的首府南宁市,地处郁江(邕江)北岸。因自治区四面环山,故向有“广西盆地”之称。广西不但河流众多,而且夏长冬暖,热量充足,因此农作物一般年可两至三熟。但在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只管残酷剥削,不管治山治水,往往“一雨成涝,不雨即旱”,农业产量很低。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大兴水利,现在许多地区已成了塘库相连、沟渠纵横,清水常流、稻花飘香的鱼米之乡。

广西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稻米、玉米、红薯,其中水稻种植几乎遍及全区,是我国水稻的重要产区之一。有些地区也种冬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是我国甘蔗的主要产地之一。此外也产花生、烟草、苧麻、黄麻、木茹蚕等。桂南、桂东南地区,还一向盛产水果,柑橘、橙、柚、香蕉、菠萝、荔枝、桂圆等。现在这些地区还种植了橡胶、咖啡、胡椒、剑麻、香茅等多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西的森林也十分茂密。北部山区和红河流域,林区面积很广,盛产杉、松、椎、栎、竹、樟、楠、桉等各种用材林木。桂西南还有不少名贵树种,如:银杉、榧木、苏木、金丝李、铁树、柳杉、格木等。尤其是柳杉、银杉,历来为人们所珍视。当地的经济林品种也比较多,其中著名的有:油茶、油桐、八角、玉桂、栓皮栎、板栗等等。特别是八角、茴油、桂皮,不但国内有名,国外也很有名。广西南濒北部湾,是我国著名的大渔场,鱼产品

十分丰富，尤其是石斑鱼、红鱼、对虾、鱿鱼，产量更多。北部湾沿岸还有好多珍珠、蚝类等养殖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负有盛誉的“南珠”，就是产在当地的北海和合浦一带。



回 族

广西还有不少著名的游览胜地，大家比较熟悉的如桂林、阳朔，它早在我国古代，即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我国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的陕、甘、宁边区，其中“宁”，指的就是宁夏。它的首府银川，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塞上名城。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宁夏境内的六盘山时，曾写下了壮丽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一九六一年九月，应宁夏各族人民之请，毛主席又特地再次手书了这首词，对宁夏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巨大的激励、鼓舞作用。

宁夏地处黄河中游，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就利用黄河水利，在宁夏平原地区发展灌溉事业，筑有秦渠、汉渠和唐徕渠等著名渠道，从事农业生产。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塞上江南”、“塞上天府”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但是，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使当地土地大片荒芜、古渠常年失修，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都极度贫困。解放以来，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除了整修扩建旧有渠道，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兴筑水库、发展机电排灌，还新修了第一和第二农场渠、跃进渠、西干渠等，宁夏才恢复了“塞上天府”的青春，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宁夏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稻米、糜子、高粱、玉米、莜麦、荞麦，尤以春小麦为最多。经济作物有胡麻、大麻、芸芥、油菜、棉花、甜菜。特别是胡麻，在全区经济作物中，占的比例最大。

宁夏的畜牧业也很发达。牲畜以牛、羊、马和骆驼为主。当地出产的滩羊皮和沙毛皮，历来属裘皮中的佳品，在国内外俱负盛誉。

除了名贵的裘皮、枸杞子、甘草、贺兰石（外科手术刀的磨刀石）、发菜外，阿拉善左旗（“旗”相当于县）的驼毛和吴忠县的地毯，也是著名的特产。

我们的祖国是如此富饶美丽。上面介绍的，还只是五个省一级自治区的概貌。

谁都知道，云南省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全省境内，有八个民族自治州和十五个民族自治县。省会昆明四季如春，是著名的“春城”。因气候适宜，在云南省境内，不论热带、寒带各种植物都能生长，因此素有“植物王国”之称。还有许多特有树种，如云南松、滇油松等。盛产木材、药材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和著名土特产品，如柚木、紫檀、红木、樟、楠、相思、榕、茯苓、天麻、三七、麝香、鹿茸、大理石、普洱茶、云烟等等。当地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因盛产各种热带植物，还被称为“热带植物之宫”。

云南省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如龙门、滇池、石林、温泉等。

与云南省毗连，向以地形崎岖、苍山如海闻名的贵州省，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比较稠密的地区。全省群山耸立，气势雄伟，因此通称贵州高原。那里有不少著名的风景区，如世界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它的周围就是布依族、苗族的聚居区。

当地还有不少著名的土特产，如贵定烤烟、锦屏杉木、云雾山绿茶等等，大都也产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



藏 族

打开祖国地图，我们还可以看到，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一部分，也有大片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有从事畜牧业的悠久历史。例如，在我国自古就有名的黑紫羔皮和玉树羊、大通马、河曲马、欧拉羊，就是出产在今天青海省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

除了云南、贵州、青海、甘肃以外，我国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台湾省的部分山区、广东省的海南岛、四川省的西南、西北部，也都有很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绵延东北三省，有不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兴安岭，是我国木材的主要产地。黑龙江的呼伦贝尔盟、吉林的哲里木盟、辽宁的昭乌达盟，那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历来是我国优良的牧场。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北方的著名水稻产区。自治州境内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并盛产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有我国高山族聚居的祖国的台湾省，水力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植物种类多达四千余种，是我国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台湾岛是我国最大的岛屿，在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的山地上，到处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因此台湾又素有“森林之海”的称号。富有南国风光的广东省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因为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光是水稻，一年就可三熟。位于自治州中心的五指山秀丽挺拔，郁郁葱葱，它的周围是适宜于多种热带植物的种植场。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境山峦起伏。山上森林茂密，遮天蔽日；山谷平坝坡地，星罗棋布。这就使当地农、牧、林业的

发展，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自治州，统称川西高原，一向以饲养牛、羊闻名，它在我国畜牧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川西高原也有大片原始森林，木材储量非常丰富。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如此地大物博。以上举例，还只限于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见之于地面的壮丽景色和部分物产。至于蕴藏在地下的自然资源，那就更加品种多样、储量丰富。据现已查明或开采的，即达好几十种。其中在全国比较有名的，如西藏的“精碲”，它是我国的特产；新疆阿尔泰山的黄金和昆仑山麓的和田玉石，在我国古代就很有名。克拉玛依和独山子的石油，现在也已成为人们所熟知。广西的锰矿在全国是首屈一指，可作肥料和塑料的石灰岩，在广西更是遍布全区。内蒙古大青山的煤田带和白云鄂博的铁矿石，是我国著名钢铁基地之一包钢的“粮仓”。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盐池，方圆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不仅储量惊人，而且还能边采边长。这种天然盐既可食用，又是化工的重要原料之一。宁夏的煤矿也很著名。全区百分之九十的县市都有大、小不等的煤藏量，而且煤的品种齐全，质量也好。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无数珍禽异兽，诸如珍贵的熊猫、稀见的犀牛、罕有的羚羊、凶猛的虎豹、雄健的大象、美丽的孔雀。还有大量的野生植物，诸如雪莲、金丝梅、罗布麻等等，那更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

我们伟大的祖国，江山是如此多娇，物产资源又是如此富饶。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还被迫处于残酷的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等阶段，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农牧业生产十分落后，从而使祖

国的美好江山长期黯然失色,丰富的物产资源,始终得不到充分发展和利用。只有在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独立和解放后,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才更加壮丽夺目、分外妖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物产资源,才能不断发展、充分利用。

附：我国各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表

民族名称	主 要 分 布 地 区
汉 族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在长江、黄河中、下游,东北和东南沿海各省。
蒙 古 族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青海、河北、河南、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
回 族	宁夏、甘肃、河南、河北、青海、新疆、山东、云南、安徽、辽宁、北京等省、市、自治区。
藏 族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自治区。
维 吾 尔 族	新疆、湖南、甘肃等省、自治区。
苗 族	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等省、自治区。
彝 族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
壮 族	广西、云南、广东、贵州等省、自治区。
布 依 族	贵州省。
朝 鲜 族	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
满 族	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等省、市。
侗 族	贵州、湖南、广西等省、自治区。
瑶 族	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自治区。
白 族	云南省。

(续表)

民族名称	主要分布地区
土家族	湖南、湖北等省。
哈尼族	云南省。
哈萨克族	新疆、甘肃、青海等省、自治区。
傣族	云南省。
黎族	广东省。
傈僳族	云南、四川等省。
佤族	云南省。
畲族	福建、浙江、广东、江西等省。
高山族	台湾省。
拉祜族	云南省。
水族	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
东乡族	甘肃省。
纳西族	云南省。
景颇族	云南省。
柯尔克孜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土族	青海省。
达斡尔族	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
仫佬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
羌族	四川省。
布朗族	云南省。
撒拉族	青海、甘肃等省。
毛难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

(续表)

民族名称	主 要 分 布 地 区
仡佬族	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
锡伯族	新疆、辽宁、吉林等省、自治区。
阿昌族	云南省。
塔吉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怒族	云南省。
乌孜别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俄罗斯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鄂温克族	黑龙江省。
崩龙族	云南省。
保安族	甘肃省。
裕固族	甘肃省。
京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
塔塔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独龙族	云南省。
鄂伦春族	黑龙江省。
赫哲族	黑龙江省。
普米族	云南省。
门巴族	西藏自治区。
珞巴族	西藏自治区。

第二节 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 我们伟大祖国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文字可考的，我国就将近有四千年的历史。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毛主席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族劳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在祖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是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战胜了各种困难，才共同开拓了我国这样辽阔的疆土，创造了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

远在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商业交通就比较发达，国内大小市场也已逐步形成。我国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这种以大小市场为枢纽的经济联系，又继续有所加强。于是，突破了奴隶制宗法分封组织，而日益壮大起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就积极要求有一个统一的王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当时，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工程，也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同时，由于一部分民族的统治阶级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相互掠夺和频繁骚扰，给各族人民带来离乱困苦，全国各族劳动人民更加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秦始皇，坚定地实行法治路线，统一了全中国，这是合乎历史潮流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的。从此，中国就结束了自



维吾尔族

西周至战国八百多年的诸侯割据，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因此，我们伟大的祖国又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两千多年前，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实现全国规模的大统一，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英勇斗争。我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也出现过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或封建割据势力所造成的分裂局面，但是，由于各族人民坚持统一的不懈斗争，我们国家的统一局面基本上是连续而稳定的。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兄弟联系，经济和文化交流是始终在不断发展的。

回顾祖国历史，我们在充分肯定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而进行的无数英勇斗争，是发展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定力量的时候，特别要指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这一伟大事业上的功绩。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长期以来，即世居在祖国的边疆。千百年来，他们在辛勤地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发展同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族人民的密切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他们为实现祖国的统一，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全国各民族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经济、文化交流，是使祖国形成统一，并获得不断巩固的基础和纽带。

根据史书记载和大量出土文物证明,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人民,还在很早的古代就有了密切的联系。

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祖先“肃慎”,远在商、周时代,他们还处于原始的狩猎阶段,便经常和祖国中原各民族人民有了联系。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他们还不断以木石制成的“楛矢石砮”贡献给周朝,表示臣服于周。东汉和两晋时代,居住在不咸山(即长白山)以北和牡丹江流域的满族祖先“挹娄”、“勿吉”,更经常用他们的貂皮等物产,与中原汉族换取布匹和铜、铁器皿。到了唐朝,满族这一历来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成员之一的民族,已直属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以后,满族又称为“女真”族。在清朝统一中国以后才称满族。

我国新疆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西域”,意即祖国西部的疆域。远在两千多年前,整个新疆地区,就已统一于祖国的版图。公元前六十年,当时的西汉王朝已在西域的乌垒城(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策特尔)设立西域都护,作为中央政府派驻当地的最高长官,统辖天山南北。西域的统治官员,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成为汉朝的地方官员。铁的事实说明,新疆在汉代已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公元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把西域改称为新疆,在当地设置了以伊犁将军为首的行政机构,管辖包括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和巴尔喀什湖直至帕米尔等地的军政事务。

在很早的时候,新疆各族人民就和内地的各族人民开始了比较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沿用的古老农田水利设施“坎儿井”,即系根据两千多年前从内地汉族人民传来的开凿并渠方法修建的。古代新疆的冶铁术,

以及用牛耕田,养蚕丝织业等,也都是在祖国内地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新疆各族人民的劳动智慧,生产技术,也大大丰富了祖国各族人民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如现在大家熟悉的棉花、大麻、苜蓿、葡萄、核桃、黄瓜、胡萝卜、豌豆、大蒜等等,最早就是从新疆引种到全国各地的。新疆和内地的贸易联系也很密切,商队来往不绝。他们从内地运到新疆的产品主要有各种丝织品、茶叶、纸张、铁器等等,从新疆运进内地的土特产,诸如牲畜、皮货、棉毛织品和各种干果、药材、香料、玉石等等。其中,祖国内地的纸张和雕版印刷术的传入,还对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宋以来,新疆一直兼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来书写、印刷文书和典籍。一九五九年,在新疆若羌县发现的两件《诗签》,作者是唐代元和年间维吾尔族人坎曼尔,他在《诗签》的两面即分别写着民族文字和汉文。《诗签》的内容提到,作者祖孙父子四代,都是热衷于学习汉文的。古代新疆维吾尔族中的有些知识分子,往往一人能精通我国几个民族的文字,在编撰和翻译祖国史书方面有显著成就。如元代有个叫必兰纳识理的维吾尔族翻译家,除了维吾尔文,兼通汉、蒙、藏三种民族文字,通过他的翻译作品,为沟通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现在广西壮族的祖先“西瓯”或“骆越”部落,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汉族有着友好的联系和密切的来往。到了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等三郡,广西与中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很多壮族人民,由于自古以来就同汉族人民有着密切往来,所以也会使用汉语和汉文。

我国北方著名的蒙古族,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和殷周时代,就与祖国内地发生了经济和文化联系。蒙古族的劳动人民,与

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从来都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公元十三世纪，当我国蒙古族还没有本民族文字时，开始是由畏兀儿（维吾尔）族人用维吾尔文，帮助他们书写蒙古语言，后来，蒙古族人民又参照藏文字母和古汉文方块字格式创制了本民族通用的蒙文。而我国满族人民过去通用的满文，则是根据蒙文字母加以演变而成。此外，我国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如回族、畚族等等，历来把汉文作为他们本民族通用的文字。

藏族在我国各兄弟民族中，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还在很早的古代，我国藏族人民就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团结一起，共同劳动、生息在祖国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并在创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过程中，结下了深情厚谊。

远在公元七世纪，藏族的第一任“赞普”（藏王）松赞干布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了西藏地区。公元六四一年（唐贞观十五年），唐朝的封建皇帝李世民从维护国家统一出发，积极赞助与西藏的友好关系，还将他的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给当时的西藏第一任“赞普”松赞干布，从而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团结合作和友好往来，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段民族和睦团结的历史，当时唐朝著名的宫廷画家阎立本，还曾以李世民接见松赞干布派来求婚的使者禄东赞时的生动场面，精心绘制了一幅《步辇图》。至今这幅著名的古画还珍藏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

继文成公主之后，公元七一〇年，唐高宗又把他的养女金城公主远嫁入藏。

随着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先后远嫁入藏，内地的汉族

经济、文化，便源源不绝传入西藏。在文成公主入藏时，即带去大批汉族“杂伎诸工”和绸帛、器具、谷物种子等，还带去了大量文学、史学、医药以及各种生产技术书籍。此后，松赞干布也不断选派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并聘请汉族工匠去西藏传授制造农具，和从事园艺、刺绣、养蚕、碾磨、酿酒、制陶、纺织、造纸、制墨、冶金、建筑等等各种生产技术。与此同时，西藏和祖国内地的贸易也进一步得到发展，内地的茶叶、丝绸等大量运入西藏，西藏的土特产也不断输入内地。唐太宗逝世时，松赞干布曾以君臣礼特地派人到长安吊唁，并接受唐王朝给予的“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的册封。以后又晋升为“宾王”。所有这些，都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使藏汉人民“地合一家”，“如手足之相卫，唇齿之相依”。至今西藏还保留有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物，传诵着藏汉人民友好传统的动人故事。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迄今尚矗立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大昭寺门前的一块唐代“甥舅联盟碑”（又名“长庆会盟碑”）。碑上镌刻的，即是藏、汉两族人民悠久的兄弟情谊的历史史实。



苗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世居在台湾的我国高山族，据不少出土文物资料证明，他们的祖先，最早系来自祖国的东南沿海一带。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文化联系，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开始。一千多年来，祖国沿海福建、广东的移民同高山族人民共同对台湾省进行了开发。至晚到了宋、元时代，当时的封建王朝已在台湾澎湖设官建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政辖区。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倭寇和荷兰、西班牙、美国等殖民

主义者都垂涎台湾的富饶物资，先后曾多次入侵，但每次都遭到了我国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坚决抵抗。在历史上，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为保卫台湾、保卫祖国，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曾经多次并肩战斗，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台湾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各族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古代，由于历史、地理、交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我们伟大祖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生产技术水平、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总的说来，从秦、汉到清代的前期，中原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农业生产，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由于冶金术和养蚕制丝业的不断发展，铜、铁器皿和丝绸的应用，在秦、汉时期也已经相当广泛，并且开始影响和传入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从而也就促进了这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但是，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不少方面是比较先进的，他们的先进生产、先进技术也丰富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例如我国边疆地区的一部分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等，他们的畜牧业自古就比较发达。当中原汉族地区还没有棉毛织品时，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却早已种植棉花，并且有了棉毛织品。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从秦代开始，世居当地的各族人民已经利用黄河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当地至今还保存着筑自秦、汉以及唐代的著名水渠：“秦渠”、“汉渠”和“唐徕渠”。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农业也比较发达。壮族的祖先骆越部落，在秦末设郡县之前，即已知耕种水田和引水灌溉了。到隋、唐时代，广大壮族人民已广泛使用铁犁、牛耕和水利设施。并且发展了矿冶、纺织等手工业。还在很早以前，



彝 族

壮族劳动妇女精湛的手工艺品“壮锦”，即以色彩绚丽、图案精美又富有民族特色而著名。同时，根据近年来在广西地区出土的大量铜器推考，当地壮族人民，也极可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铜器。我国世居在东北地区的满族祖先“肃慎”、“挹娄”，在公元一至五世纪时，也即以善种五谷、好养猪和能纺麻织布知名。聚居在云南省红河两岸的哈尼族劳动人民，还在很早以前，就善修梯田。现在红河两岸山坡上高达百数级以至上千级的层层梯田，有不少还是哈尼族的祖先世代辛勤劳动的成果。世居在我国四川省境内的羌族人民，远在两千年以前，即精于筑堤、打井。公元前三百年，秦王朝委派李冰父子，领导岷江上游各族人民兴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时，就有大批羌族劳动人民参加。至今遍布在四川省川西平原的许多水井，大也都凝聚有羌、汉等族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国元代杰出的汉族女纺织家黄道婆，早年她的纺织技术，也是在我国海南岛向黎族劳动妇女学习的。一直到她的晚年始返回江南，一边研究改进，一边在故乡劳动人民中积极传授、推广。

在祖国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少数民族人民还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为祖国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不少光辉的科技成就。例如，在祖国农学史书中，一向被列为重要著作之一的《农桑衣食撮要》，它就是元代维吾尔族的著名农学家鲁明善的作品。我国著名的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在元代不仅为祖国撰写了有名的“万年历”。并且还在北京建立了观象台，创制了多种天文仪器，为祖国的天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个著名的回族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在元世祖时，曾经负责规划并领导元大都的设计建筑工程，为此后北京

城市建设的发展,创造了基础。距今二百多年前,我国著名的蒙古族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测绘学家明安图(又名明静庵),他的数学著作《割圆密率捷法》,曾在我国数学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汉族的文化艺术固然曾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但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通过不断联系交流,也曾经影响和丰富了汉族的文化艺术领域。比如现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民族乐器:笛、箫、铜钹、琵琶、胡琴、腰鼓、羯鼓(京剧伴奏用的小鼓)等等,都是从汉代开始,陆续从各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汉族地区的。

再如在建筑艺术方面,我国各民族也很早就开始了相互交流和影响。一方面,我国汉族的古典建筑,诸如朱户铜环、碧瓦雕檐式的亭台楼阁、庙宇寺院,还在很早以前就遍布全国,至今我国边疆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仍到处可见;而另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的建筑艺术,在祖国内地,同样也有不少保存。其中比较著名的,如现存河南安阳的白塔,和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居庸关”,就是按藏族的建筑艺术风格建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侗族聚居地区,也有不少著名的侗族古代建筑如鼓楼、风雨楼、风雨桥等,不仅结构精巧,而且坚固耐用。特别是位于三江地区的“程阳桥”,我国邮电部还曾经在纪念邮票上作过专幅介绍。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红宫,当年在建筑时,为了吸收各民族的建筑特色,还特地从祖国内地邀请了五十多名汉族和蒙古族的建筑工匠参与建筑。此外,如云南白族的著名门窗木雕,新疆各族人民的石膏花饰,就是现在,在我国一部分建筑物上,也还可以经常看到。

仅从上述列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也可以证明:在我们这个

伟大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我国各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生活，是自古以来就是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祖国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也正是由于我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了共同的才能和智慧，才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创造了祖国如此发达的文化。同时，上述历史事实又说明了，象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千百年来，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我们伟大祖国的经济、文化，同样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必须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不断巩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我国各民族更加繁荣富强和兴旺发达。

第三节 少数民族人民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

由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共同缔造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有

革命传统的国家。可是在周秦以来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以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反动阶级的压迫剥削，使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长期遭受着极为深重的苦难。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的历史中，沙皇俄国很早就伸出了它的魔掌。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主义者就从西伯利亚南下，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和抢掠。一六四三年，沙俄侵略军头子波雅科夫，不仅肆意劫掠、屠杀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并且公然下令“以被杀害的居民的尸体作为食物”。一六五〇年初，沙俄的另一个侵略军头子哈巴罗夫又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一个叫做桂古达尔的村庄，就杀了达斡尔族男子六百六十一人，抢走妇女二百四十三人和小孩一百一十八人。他们杀死我国居民，然后又“用父母的尸体搭成烤架来烧烤孩子们”。当地居民曾怒斥这些侵略者是一伙“吃人生番”。列宁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女儿。”（《中国的战争》）

沙俄侵略者还侵占了我我国大片领土。仅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就从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攫取了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面积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沙俄是掠夺我国领土最



壮 族

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全盘继承了老沙皇侵略衣钵的苏修新沙皇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一再喋喋不休地为当年老沙皇侵占中国领土辩护，而且还把十七世纪入侵我国的波雅科夫、哈巴罗夫一伙沙俄强盗说成是值得“后代人永远怀念”的“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开发者”，甚至用哈巴罗夫的臭名命名苏联的城市和车站。苏修新沙皇还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事端，发动武装挑衅。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武力手段，先后胁迫我国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取得他们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特权。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单是沙皇俄国就强迫清王朝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在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地，取得了自由贸易、货物免税、开设银行、发行货币、强购土地、建筑铁路、设立工厂、开采矿产、创办邮电、建立教堂、开办医院、设置学校，以至驻扎军队和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种种特权，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他们把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作为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工业原料的市场，阻挠这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地区原有的手工业，迫使大批农、牧民和手工工人纷纷破产，生活日益贫困。

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他们的教堂、医院、学校，麻醉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并从事间谍活动，收买和培养民族败类，以作为他们进一步侵略我国并阴谋长期奴役我国各族人民的工具。在新疆，当时沙皇俄国就曾经利用伊斯兰教充当侵略工具，他们收买宗教上层分子，以传教为幌子，煽动旨在分裂我

国统一的反动叛乱，用心十分险恶。

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在旧中国，沙皇俄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以至葡萄牙、西班牙等帝国主义，也都对中国实行过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我国各族人民还遭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加严重。

清王朝除了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血腥统治之外，对于少数民族还采取了一系列“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反动政策。他们一方面用高官厚禄去收买、扶植各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为其所用。然后通过这些剥削阶级去统治、镇压、剥削他们本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清王朝又严禁不同民族人民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与语言文字，蓄意阻碍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制造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更恶毒的是，为了不断削弱以至消灭一部分少数民族，清王朝还不断挑拨民族纠纷，唆使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内部进行大规模的所谓“打冤家”之类的流血斗争。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毛主席指出：“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论联合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穿着本民族的服装。

有些地区，甚至禁止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进入城市。



布依族

为了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效法清王朝，收买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分子外，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汉族地区同样推行的万恶的保甲制度，并经常出动大批军警，对少数民族进行血腥屠杀。例如一九四三年震动全国的对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抗日时期多次对甘肃回族人民的屠杀事件，都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为了镇压四川凉山彝族人民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出动了一方多名反动军队和三架飞机，对广大彝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杀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血腥镇压，竟使普雄、越隽一带，数十里不见人烟。

在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广西东兰县的苛捐杂税，名目就多达四十三种；现在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当时更多至六十三种。在云南省，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苛捐杂税，最多达到二、三百种。就连他们的飞机飞越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向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按人口强征“看飞机费”。在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农业税却已经预征到一九五二年。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就连国民党的党费，也要分摊在各族人民头上。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各族人民的剥削、掠夺，就是这样穷凶极恶，无奇不有。

帝国主义、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我国少数民族人

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形式(尤其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这就更加加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深重苦难。

解放前，在我国西藏和云南的藏、傣等民族聚居地区(约有四百万人口)，还保持着封建农奴主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经济形态。在这些地区，封建农奴主占有全部或绝大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并掌握着各级政权。广大农奴不仅毫无土地，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终年辛勤劳动所得，百分之七十左右被农奴主所掠夺。例如聚居在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解放前即长期处于这样的农奴制社会。农奴主不仅霸占着当地全部山、水、土地以至一草一木，并且占有全体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连走路、喝水都得向农奴主缴钱。农奴死后，更得向农奴主请购葬地。甚至劳动人民在山上猎到野兽，也必须把猎获物的一半缴给农奴主。此外，农奴主全家的衣食住行的劳役，都由被指定的寨子承担。尤其残忍的是，农奴主还经常以迷信的或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认为不满意的各族劳动人民，用所谓“赶琵琶鬼”的名义，驱入深山老林，或进行任意虐杀。

比之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封建农奴制度更残酷的，还有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生活在西藏地区的一百二十多万藏族劳动人民，曾长期处在世界上最反动、最残酷、最黑暗、最野蛮的农奴制阶段。

在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阶级。一小撮封建领主，他们牢牢掌握着全部政权。过去的“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为“噶厦”)由于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政府官员全

部为贵族和宗教上层所把持。这些贵族、宗教上层和政府官员,都是西藏的大农奴主,因此习惯上称为“三大领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约占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却占有整个西藏地区的主要生产资料,即全部土地(包括山、水、森林、草原)和大部分牲畜,统治着占西藏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劳苦农、牧民。广大农民没有一寸土地,大部分牧民没有自己的牲畜。因此,他们是世代受三大领主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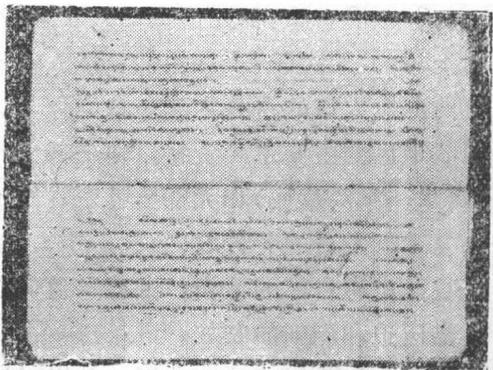
朝鲜族

西藏的农奴分三个阶层:差巴、堆穷、朗生。其中朗生的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条件也最苦,他们是封建领主的家奴。朗生除了本人终身替领主干活,子女长大以后,也还是领主的朗生。差巴、堆穷虽然可以得到领主指定的一小块不好的所谓“份地”,但每年必须拿出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时间,用自己的农具,甚至自带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并且还要承担领主指派的各种无偿劳役,因此生活也极度贫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向领主告借高利贷。民主改革前,大批农奴因无力清偿不断累积起来的高利贷款,不少人竟欠了几辈子、几百年的债。

过去西藏的农奴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自由的。领主如果把庄园转给别人,农奴就连同土地、牲畜、农具一起转属新的领主,未经许可,不准离开原来的土地。倘若私自逃跑,一经抓住,就要处以大量罚款和种种酷刑。广大农奴世代承袭着“会说话的牲口”的悲惨身世。领主、管家对农奴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可以任意对农奴进行鞭笞、拷打以至割鼻、挖眼、斩去四肢、凌迟处死和剥皮抽筋。解放前,在西藏三

大领主的日常用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利用农奴头盖骨做成的、镶有金边银边的饭碗和用农奴头顶骨磨制而成的“佛珠”。在拉萨“西藏革命展览馆”阶级教育厅的一个玻璃柜里，至今还陈列着一串当年反动农奴主总头目达赖手捻的用一百零八个人的头顶骨磨制而成的“佛珠”，每一颗“佛珠”就是一个农奴的生命。

除了上面所举的残酷压榨，西藏的三大领主还对农奴规定了名目繁多的捐税。什么“出生税”、“娃娃税”、“人头税”、“送尸税”等等。直至民主改革前，如果要问西藏究竟有多少种苛捐杂税，那是谁也无法回答的。因为除了西藏地方政府规定的数不清的捐税项目外，每个农奴主又可以任意巧立名目，增加各种捐税。



用来镇压农奴的野蛮法典



农奴主镇压农奴反抗的部分刑具

奴制下的旧西藏



街头到处可见的乞食待毙的农奴



农奴抱着初生婴儿，在农奴主那里
登记入册，缴纳出生税

对于这样一种反动、残酷、黑暗、野蛮的农奴制度，虽然广大傣族、藏族劳动人民也曾多次进行斗争，要推翻这种制度，但是帝国主义、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总是支持、扶植农奴主，镇压农奴革命，竭力维护这种农奴制度，希望它千年万代地保留下去，以便他们永远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吮吸人民的膏血。甚至在西藏解放后，准备进行民主改革时，帝国主义还唆

使、策划印度扩张主义者，勾结、支持以达赖为头子的西藏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抗拒改革，大搞分裂活动，妄图永世保留西藏的农奴制度，不让西藏人民翻身解放。

解放前，聚居在我国四川、云南两省毗连的凉山地区，约

有一百万人口的彝族，还保持着比农奴制更落后的奴隶制度。奴隶主不仅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且占有生产者奴隶。

彝族奴隶制社会有四个严格的等级：黑彝、曲诺、阿呷（安家）、呷西（锅庄）。其中黑彝是世袭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尽管它的人口只占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但却占有凉山地区的整个山林土地。奴隶主对奴隶还可以任意买卖或处死。解放前，在凉山彝族地区一匹马有的要值一千多两银子，而有的青年奴隶却只值一百多两银子。奴隶主虐杀奴隶的野蛮凶残，更是骇人听闻。诸如抽脚筋、剪肉、割耳以至分尸、活埋、坠崖，等等，真是惨不忍闻。过去，在凉山的奴隶中，呷西的地位是最低的，他们只是奴隶主家里锅庄旁边的家奴，因此又叫“锅庄娃子”。在奴隶主眼里，呷西还不如他家里的猪狗。呷西整天在奴隶主全家监督、鞭笞下从事无休止的繁重劳动，得到的却连猪狗食也不如的食物，而且还不准吃饱。晚上还只许同猪狗睡在一起。为了防止奴隶夜间逃跑，奴隶主在临睡前还给呷西穿上几十斤重的木鞋，并锁上粗大的铁链。奴隶因病或年老丧失劳动力时，奴隶主就把他推入高山峡谷，或摔进荒野的深坑，然后又投下一批乱石，把他活活处死。

由于奴隶制度的反动落后，广大奴隶的生活都极度贫困悲惨。他们终年披的是破烂麻片，吃的是各种野菜。绝大部分奴隶，祖祖辈辈连鞋也没有看见过，一年四季光着脚为奴隶主从事繁重的劳动。

凉山彝族地区，解放前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只由近百个互不隶属的黑彝家支分割统治。一个“家支”，就是一个父系血缘（部分地区也有母系血缘）集团、一个独立王国。它是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实行专政的工具。这种反动的家支制



度,加上反动的等级制度,是套在广大奴隶颈上的沉重枷锁。

凉山彝族地区之所以直到解放前夕,尚处在如此落后、反动的奴隶制阶段,它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彝族的奴隶主阶级,长期实行反动统治的结果。早在宋代,凉山的边缘地区,就开始出现了封建经济的萌芽。到了清代,随着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在凉山边缘地区、甚至腹心地区的昭觉,还相继出现了临时集市。但是,为了扼杀凉山彝族社会的进步,历代封建王朝不仅三令五申,严禁各族人民和彝族往来,对凉山地区实行封锁,而且还不断策动奴隶主对广大劳动人民恣意烧杀、掳掠,破坏彝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更深入凉山地区,勾结奴隶主、抢夺民财,霸占土地、兴筑教堂。除了利用宗教迷信去毒害广大彝族劳动人民外,还一再唆使奴隶主挑起“打冤家”械斗,掳掠奴隶,破坏生产。国民党反动派更是仇视少数民族的进步。在凉山,他们一面扶植奴隶主,供应武器,委以军职,百般挑拨彝族内部团结,一次又一次挑起大规模冤家仇杀;一面又采用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阻碍凉山地区的社会发展。他们还屠杀广大的彝族人民,并乘机掳掠人口,公开进行奴隶买卖。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蓄意阻挠、破坏凉山彝族的进步,以致迫使当地广大彝族劳动人民如此长期地处身在无比苦难深重的深渊。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压迫下,聚居在云南省边疆地区的独龙族、怒族、佤族、傈僳族、布朗族、崩龙族、景颇族,以及分布在黑龙江省等地的鄂伦

春族、鄂温克族和赫哲族中，和广东省海南岛地区的部分黎族，解放前，还生活在虽有阶级分化但又保持着原始公社某些残余的落后状态。这部分民族，因长期被困处于道路险阻、交通闭塞的深山峡谷或原始森林中，生产、生活水平都极度低下。其中有的民族还停留在原始的渔猎阶段。即使已有农业经济的，它的生产水平也属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铁质生产工具非常之少，主要还靠一些简陋的竹、木工具，从事粗放的耕作。因此常年过着“种一坡，收一锅”的极端贫困生活。为了维持生存，这部分民族的劳动人民就不能不依靠采集野生植物和兼事渔猎劳动。

上述这部分少数民族，为什么会落后于现代社会几个世纪？它的罪恶根源，就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不断压迫和侵略。

例如，一八〇三年，清王朝为了镇压傈僳族人民的起义，他们竟把傈僳族人民日常生活、生产的铁质用具，也全部列为武器，统统予以没收。到了一九一二年，北洋军阀政府又步清王朝的后尘，先后多次下令，搜缴当地的铁质农具，这就大大破坏和阻碍了傈僳族的社会生产发展。再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期间，为了防止鄂伦春族人民的反抗，除了对他们实行法西斯的血腥统治外，还严禁他们走出森林，从事农业或和其他民族交流往来。直到一九四〇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把鄂伦春族很少的一点农业，以至住房和农具全部加以毁掉，并使用武力，再次把他们重新赶进深山老林，迫使他们继续过那原始落后的游猎生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我国各族劳动人民

包括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就是这样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主席指出：解放前，“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第四节 少数民族人民的英勇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回顾旧中国整个历史，它既是一部我国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血泪史，同时也是一部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反帝、反封建和反对民族压迫的英勇革命斗争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历史上，各族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曾经爆发过无数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是这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东汉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羌族劳动人民，和聚居在今天云南、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当时封建王朝的苛重税收、强迫远征和地方豪强的残暴压榨与奴役，即先后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北宋、南宋时代，聚居在湖南境内的瑶族农民也因不堪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曾联合汉族人民多次举行起义。元、明时代，世居在福建的畲族人民和聚居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壮、瑶、苗、彝等族人民，或为反对繁重的赋税，或为对抗酷吏

的迫害，也都不断举行起义。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的这种反抗斗争，就更加频繁激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一七四〇年的湘、桂边区苗、瑶、侗等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一七八七年台湾高山族的农民起义，等等。每次起义，都曾给予当时的封建王朝以有力的打击。特别是一七九五年，贵州苗族人民在清朝乾隆、嘉庆期间举行的“乾嘉暴动”，规模巨大。当时起义群众用竹竿、大刀、岩石，战胜了清王朝的封建武装，接连攻占了五、六座县城，使清王朝陷入了极度惊恐。为了扑灭这次暴动，清王朝曾不惜从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纠集了十多万兵马进行血腥镇压。但是，英勇的起义群众依然毫不畏惧，继续多次打败了增援的清军，并且打死了一贯镇压苗族的清军统帅——云贵总督福康安和四川总督和琳，坚持战斗历三年之久。我国各族人民的这些起义斗争，虽然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最后都遭致了失败，但通过这些此伏彼起的斗争，却一次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从而推动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对于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从来毫不妥协，一贯坚决抵抗。一六四三年，沙皇俄国的侵略者波雅科夫一伙，当他们刚刚闯入我国国土时，就马上遭到了当地人民的严正申斥：这个地区历来“从属于满洲王公，而满洲王公则从属于中国的皇帝。”坚决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之后不久，一六五〇年，当沙俄另一个侵略者哈巴罗夫再度入侵黑龙江流域时，同样也遭到了我国达斡尔、赫哲等部落“万弩齐发”的抵抗。当时这伙侵略强盗尽管变换手法，对他们首先



碰到的五个达斡尔族人装出一副笑脸，说他们是执行和平使命的商人，而且有许多礼物分送。但是，警惕的我国达斡尔族人民一眼就看透了这伙侵略者的阴谋，当即严厉驳斥说：“你骗谁？我们是了解你们这帮哥萨克的，……你们要把

侗 族

我们统统打死，然后再抢劫我们的财产，绑走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一下子就戳穿了这伙侵略者所谓“和平使命”的无耻谎言。紧接着当这伙侵略者又露出狰狞面目，明目张胆地强迫黑龙江以北的达斡尔族人臣服俄国沙皇时，我国达斡尔族人民更义正词严地责诘他们：“我们是向霞沙汗（指清朝顺治皇帝）缴纳贡赋的，为什么要把贡赋缴给你们？”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决反对外来民族侵略压迫的斗争精神。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具有共同命运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各族人民，更是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对一切侵略者都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十九世纪中叶和后半期，我国台湾省各族人民、特别是世居在台湾的高山族人民，为了粉碎美、日帝国主义者妄图侵占台湾的罪恶行径，即多次奋起反抗，给了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中日甲午战争后，只是由于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台湾才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达五十年之久。但是，就是在日本侵略者以最残暴的手段统治台湾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还是持续不断。当时，所谓“三月一小乱，半年一大乱”的局面，经常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一九三〇年十月，震撼全国的台中县雾社地方的“雾社起义”，就充分显示了我国高山族

人民敢于斗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精神。

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三三年，英帝国主义在先后两次出动武力，妄图侵占我国云南省的片马和班洪地区，两次都遭到了我国分别聚居在上述地区的景颇族、傈僳族、佤族和汉族人民的坚决抵抗，迫使英帝国侵略者不得不承认片马是中国的领土，缩回了妄图侵占班洪的黑手。

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者还为了阴谋掠夺我国长江上游和青藏高原，曾以它那臭名昭著的所谓荣赫鹏远征军，向我西藏地区，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一度侵占了我国边疆的一个重镇——江孜。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雄的藏族人民，虽然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却丝毫没有畏惧。在经过多次浴血反击后，藏族人民终于在一个深夜突入江孜，收复了被英帝国主义侵占了一个月的江孜炮台，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我们旧中国从一个封建的、独立的国家，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近代我国各族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它长期侵占中国的梦想；它们扶植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以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没落腐朽、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又往往不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甘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走狗，对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更加残酷的压迫。例如，清王朝末期，作为封建统治的反动头子“慈禧”，在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和全国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时，就曾经公开叫嚷，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她彻底与人民为敌的卖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因此，在旧中国，反帝反封建，就成了

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革命斗争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事实



瑶族

正是这样。一八五一年，在我国广西金田村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直接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除了汉族人民外，还有壮族、瑶族、回族、苗族、蒙古族、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等十多个民族的劳动人民。这次革命运动，转战十八个省，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坚持武装斗争历十四年之久。不仅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腐朽的封建反动统治，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各族劳动人民，也先后纷纷武装起义，向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一八五四年，贵州省台江地区的广大苗族农民，就是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影响下，联合了汉族、水族、布依族等族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且坚持斗争了十八年。在这次起义斗争中，各族起义农民还击毙了清王朝的“精锐”部队、湘军头子“按察使”黄润昌，和“提督”荣为善等反动头目，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八五六年，云南省哀牢山地区的彝、哈尼、汉、回、白、傣、苗、傈僳等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力量的帮助下，也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同清王朝封建反动统治英勇斗争了二十年。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二年，聚居在云南、陕西等地的回族人民，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先后多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参加和响应这几次起义的，

还有汉、彝、纳西、白、傈僳、哈尼、维吾尔、撒拉等族的广大人民。

正是我国各族人民这种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既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又加速了清王朝封建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展开了瓜分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国内各派军阀势力，又在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割据一方，互相混战。

为了反抗这种连年混战所造成的苦难，我国各族人民又积极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革命斗争。例如，一九一四年，聚居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地区的黎族人民，为了反对军阀统治，奋起组织了四千多人的武装队伍，先后攻破了万宁、陵水两座县城。紧接着，聚居在白沙县牙叉地区的黎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同军阀统治开展武装斗争。黎族人民这种此呼彼应的革命斗争，使当时盘踞在海南岛的军阀头子，个个闻风丧胆，惊惶失措。

继北洋军阀之后，蒋介石反人民集团又继承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衣钵，勾结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尤其对少数民族，还疯狂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集团残暴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全国各族人民又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此，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独立,争取各民族人民共同解放,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革命行列,并逐步走上了革命胜利的道路。



白 族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过程中,从来都是十分关心、重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党就派出干部深入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向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少数民族培养革命干部,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以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又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培养农民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二四年七月,党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二五年由湖南到达广州后,即亲自主持讲习所的工作。当时,被吸收参加这个讲习所的,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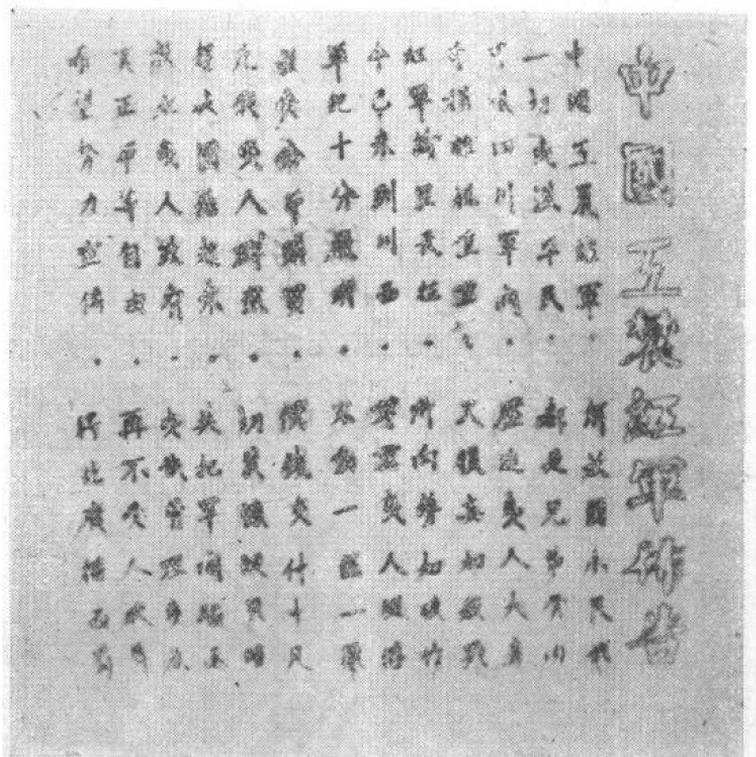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广西百色地区的壮、瑶、汉等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积聚力量,于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分别在广西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壮族人民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两个军,其中红七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就有壮族的革命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土地革命

和经济文化建设,实行民族平等政策。

一九三一年秋和一九三二年春,聚居在现在吉林省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曾先后组织了秋收暴动和春荒斗争,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地主阶级的压迫。与此同时,我国其他各地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连绵不断的大、小起义。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六月湖南地区的起义斗争,还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撤换了一贯压迫少数民族的、当时的湖南省伪省主席,废除了自清王朝开始已实行了百多年的封建“屯田”制度,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战争。当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于日本侵略者,竟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以致日本侵略者得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使东北三千万各族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面对这种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我们党立即斥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揭露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号召全国各民族人民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还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在这一号召下,东北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日斗争的高潮。至一九三二年四月,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人数,约有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三四年底,在党领导下组成了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震撼中外、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在历时十二个月中,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途中,战胜了重重困难,歼灭了大



红军长征过彝族地区时宣传群众的布告

量敌人。红军在途经十一个省时，向各族人民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当时，广西龙胜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奴隶、现在四川省甘孜地区的藏族农奴等等，就是由于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在党和红军的宣传下，才知道在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国，原来还有一个专为各民族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及由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使他们在长期遭受奴隶制、农奴制的黑暗统治下，看到了一线明亮的曙光。因此，他们

热情支持红军，给红军带路、筹粮、挑东西等等。红军在长征途中，还在沿途的各族人民中散布了大批革命种子，例如，在红军回旋时间较长的贵州西北部地区，一次便有五六千名苗、回、彝、汉族青年参加红军。后来，红军经过彝、藏族地区时，又有不少彝、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至今在全国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即是当年红军在长征途经华南、西南、西北时，参加革命的。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除了向各少数民族人民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我们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外，凡是有条件的地区，我们党和工农红军还积极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武装力量，支持各民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民兵，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面民兵干部举着的旗帜，就是当年红军赠给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

族人民组织自己的革命民主政权。例如，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在路过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时，就曾经帮助当地彝族人民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并赠送了一部分枪枝、马匹和衣服。红军在经过甘孜、炉霍藏族地区时，又领导和支持当地藏族人民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帮助他们在甘孜、炉霍等地，建立了藏族人民的政权——博巴政府（“博巴”是藏语“藏族人”的意思）。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些革命活动，不仅在当时当地给了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对以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如彝族、藏族、壮族、苗族、瑶族、羌族、侗族、回族等的人民，还经常在怀念、追述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经过时的革命斗争史迹，回忆当年各地各民族人民积极支援中国工农红军的动人景象。贵州省台江县苗族地区，一直到解放以后，还完好地保留着一幅当年红军在那里刷写的标语：“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多少年来，它还一直鼓舞、激励着当地广大苗族人民的革命斗志。贵州省锦屏地区有个侗族老农民，还把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份文告《出路在那里》，小心珍藏了多年。特别是一些当年曾亲眼见到过我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感到无限幸福。



土 家 族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我们党还领导各族人民，先后在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陕甘宁边区、河北、山东地区和广东省海南岛等地，建立了由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

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如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不少是朝鲜族、赫哲族战士），陕甘宁边区和渤海、冀中三个回民支队，以及海南岛的由汉、黎、苗族人民组成的琼崖人民抗日独立纵队，等等。

正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战斗，最终才使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和广大汉族人民一样，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立场。同时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也仍然继续推行它的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少数民族，而且对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穷凶极恶地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团结抗日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固原两地的回族农民，就是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残暴压榨和坚决要求抗日，爆发了全国闻名的“海固事变”，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一九四一年斗争失败后，有一百多人突围进入陕甘宁边区，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队伍。

继“海固事变”之后，新疆各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压迫，于一九四四年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掀起了规模更大的“三区革命”，并在上述三个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和武装部队，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新疆“三区革命”是在我国一个省区内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

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革命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不仅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下,又促使新疆各族人民比较迅速地获得了和平解放。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三区革命“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哈尼族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更加团结一致,从各个方面,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了广泛的斗争。一九四七年,震撼全国的台湾“二·二八”起义,就是一次比较突出的革命行动。当时,参加这一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的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并肩作战,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妄图侵占台湾的罪恶阴谋,同时还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正在大规模进行反人民内战的兵力。因此,党中央曾代表祖国全体人民,对这次起义,表示了热烈的支持,使台湾各族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解放战争时期,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都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了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各地少数民族人民中,又有大批优秀儿女纷纷投身到革命行列。

我国各族人民在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对于本民族内部的反动统治阶级,也从来没

有停止过反抗斗争。同广大汉族人民一样，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对于本民族中一小撮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阴谋分裂祖国统一的民族败类，以及那些一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奴隶主、农奴主和封建地主，也经常不断地采用各种形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坚决斗争。通过这些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祖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正是由于我国各族人民一贯并肩战斗，才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断推向前进。最后，终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长期压在全国各族人民头上的大山，使我国各族人民脱离了苦海，获得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永远地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奴役的历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和共同进步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争取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第 二 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各族人民摆脱了昔日的深重苦难，获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各族人民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分析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唯一科学理论。它揭示了民族发展的规律，阐明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提出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普遍原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胜利地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宝库。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粉碎

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和任何社会历史现象一样，是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支配的，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过程。

民族并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结合而成的氏族和部落，是组成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和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原始社会解体了。这时，氏族、部落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逐步有了较多的联系，人们构成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遭到破坏，逐步地为地域关系所代替。不同的氏族和部落逐渐混杂起来，逐步形成为民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国各民族的发展都有很长的历史。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



哈萨克族

了大约四千年之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汉族以外的我国各少数民族，也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几千年来，由于落后的社会制度的长期束缚，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以汉族来说，在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这种封建制度就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的封建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国各民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获得了充分发展、进步和繁荣的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了全国各民族的革命大团结。各族人民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互相尊重，友爱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由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改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的面貌。目前，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周围，为我国各民族在社会

主义道路上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努力奋斗。

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将来人类必然要从阶级社会进入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民族将逐步消亡,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从民族产生到民族消亡,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由于阶级剥削制度的存在,产生了民族纷争,加深了民族压迫,民族之间的隔阂和敌对关系越来越尖锐。只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才消除了产生民族压迫和民族之间敌对关系的基础,使各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越向前胜利发展,各民族之间就越团结、亲近。列宁说:“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为了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发展过程,达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世界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交流和合作,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最后消失,才使民族最后消亡,全世界各民族融为一体。民族消亡之时,也就是民族融合之日。所以,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才是民族消亡。

从今天的历史条件来说,到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融合,还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列宁说,各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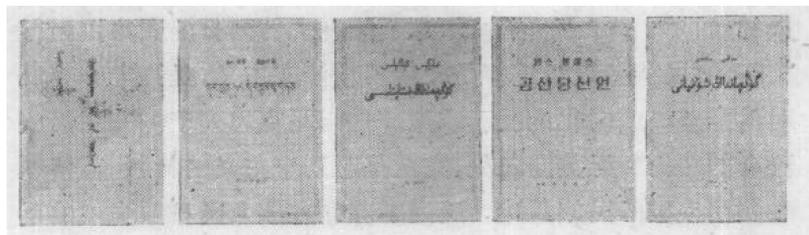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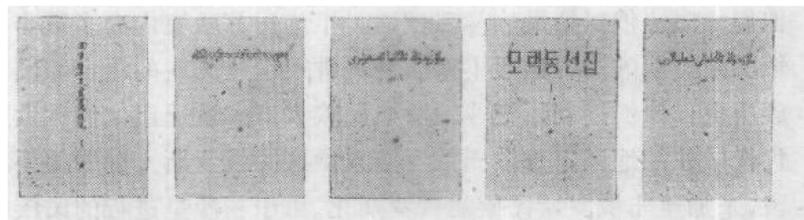


僑 族

苏修统治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各族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对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推行了一条强制俄罗斯化的反动政策。为了实现这个罪恶目的，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以“民族接近”为掩护，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理论，鼓吹苏联正在进入各民族“取得完全一致的阶段”；现在已经“有可能比较具体地设想……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的过程”；苏联“正在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这个幌子下，苏修叛徒集团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他们千方百计扼杀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文化；他们强制非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拒绝用苏联境内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出版书籍，禁止讲授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民族历史；他们还利用把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大量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分散到俄罗斯人地区同俄罗斯人混居的手段，来加速非俄罗斯民族的俄罗斯化。由于新沙皇进行的民族压迫，使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或者日渐减少，甚至灭绝的情况。苏联已经重新成为沙皇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勃列日涅夫集团强行推行的“民族接近”，纯粹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列宁一贯反对的强迫民族同化的反动政策。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融合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苏修领导集团残酷的民族压迫，遭到了苏联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苏联各族人民正在为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为争取各民族的完全解放而斗争。

第二节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民族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



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五种民族文字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民族都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组成民族的基本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资本家、地主、奴隶主，他们总是少数；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工人、农民、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剥削阶级统治的黎族社会里，占民族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掌握着政权，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一个民族仍然由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两部分人组成。不同的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阶级未彻底消灭以前，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阶级对立。民族决不是一个利益完全一致的整体。

民族压迫产生于阶级剥削制度。早在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这就是说，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由于其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不以压迫和剥削本民族劳动人民为满足，总是竭力去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压迫。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常常发动征服异民族的战争，掠夺它的土地和财物，强迫它缴纳贡赋，奴役它的人民。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继承和利用这个“遗产”，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压迫和奴役更多的民族，甚至用消灭殖民地人民的办法实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近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争夺和瓜分造成的。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

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所谓民族压迫，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全体去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全体，而只是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去压迫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

在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被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虽然和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有矛盾的方面，但是他们压迫、剥削的阶级本性是一致的。当帝国主义和压迫民族剥削阶级的侵略，使被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往往会投靠帝国主义和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充当其走狗和帮凶，成为民族利益的叛卖者。解放前，我国外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内有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实质上是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阶级压迫。国内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实质上是汉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勾结一起，共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时，各民族的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民族投降派，和侵略者一起压迫各族劳动人民。如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汉族的大劣绅、大军阀、大买办中一小撮亲日派，为了保护他们的剥削利益，撤去了民族的界限，公开投靠日寇。而国民党顽固派则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继续压迫国内各族人民。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人物，如一些王公、活佛、贵族、领主、土司等，出于他们反动统治的利益，则与国民党军阀相勾结，共同镇压

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固原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掀起了三次武装暴动(即有名的“海固事变”)，都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回族上层败类马鸿逵、马步芳镇压下去了。有些少数民族的民族败类，如蒙古族的德穆楚克栋等，甚至直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内蒙古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总之，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集团和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对我国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的压迫和剥削，是过去我们国家受欺凌、民族遭苦难的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是根本违反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首先必须进攻本国人民，强迫他们提供推行殖民政策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用侵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装力量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用反动的思想毒害本国劳动人民，并且依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量掠夺和残酷奴役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反动统治。这样，就使自己国家的劳动人民遭受更加深重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同样，以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代表的汉族反动统治集团在压迫我国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加重对汉族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反动武装力量，既被用来压迫少数民族，也被用来镇压汉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挑拨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团结，破坏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巩固其反动的阶级剥削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所以，不论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压迫民族的

劳动人民，都是民族压迫政策的受害者。正如列宁指出的：“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民族平等》）可见，在民族压迫政策下，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劳动人民，有着受压迫受剥削的共同命运。

既然有民族压迫，就必然有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是被压迫民族劳动人民和压迫民族劳动人民的共同的阶级利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实现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就是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胜利。也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在当前的世界上，压迫、侵略和欺侮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只要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就一定能够最后消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

被压迫民族实现了从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下的解放，并不是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民族问题仍然存在。民族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阶级问题。

我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



傣 僳 族

迫以后,由于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废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各民族相互平等,团结在统一祖国的大家庭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章程》)国内各民族中一小撮老的剥削阶级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无时不在制造民族纠纷,进行分裂民族团结的活动,破坏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妄图复辟旧制度。帝国主义,尤其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处心积虑地阴谋侵略和颠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内外阶级敌人互相呼应、互相勾结,对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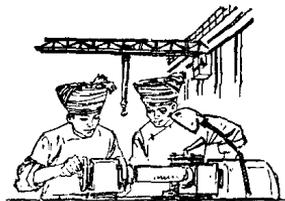
建国以来,在我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反映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不但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如在建国初期,接受美帝国主义间谍马克南指使潜伏下来的哈萨克民族败类乌斯满、贾尼木汗匪帮,不但在新疆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活动,还窜入甘肃、青海等地区,勾结当地哈萨克族中的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暴乱。一九五九年,以达赖为头子的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反动的农奴制度,竟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发动了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达赖叛国集团逃亡国外后,在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的卵翼下,继续进行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罪恶活动。平定达赖叛国集团以后,西藏广大劳动人民

又揭露了以班禅为代表的西藏农奴主阶级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批判了他们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猖狂活动。一九六二年，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策划和直接指挥下，新疆一批最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伊宁发动了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煽动和组织大批边民外逃。新疆各兄弟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粉碎了他们的颠覆叛国活动。二十多年来，国内外阶级敌人一直没有停止过破坏我国各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反革命活动。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和林彪，适应各民族反动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没有停止过干扰和破坏毛主席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活动。这同样是民族问题上阶级斗争的反映。

历史的实践证明，阶级的划分比民族的区分更为深刻。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各族劳动人民虽然分属许多不同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受压迫受奴役的共同命运，都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兄弟。他们说：“苦同根、甜同源，民族不同、阶级亲”。而各民族一小撮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败类，如汉族的蒋介石、藏族的达赖和班禅、蒙古族的德穆楚克栋、回族的马鸿逵、马步芳，以及各民族的地、富、反、坏分子，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各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列宁说得好：“在股份公司里，各民族的资本家都是坐在一起的，彼此十分融洽。在工厂里，各民族的工人都是在一起工作。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历来的剥削阶级，为了压迫其他民族，或者为了维护自己

的反动统治而出卖民族利益，总是盗用“民族”的名义来掩盖他们反动政策的阶级实质。



低 族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干尽了侵略的坏事，但他们却把侵略说成“友谊”，是他们的“国际责任”，把他们的殖民政策说成是符合本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人民利益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压迫其他民族时是这样说的。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时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这样说，是企图模糊各族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转移各族劳动人民的斗争锋芒。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时，我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私利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也打着“民族”的旗号，掩盖他们反动政策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民族的“主体”、“民族利益的代表”，甚至无耻吹嘘自己是“民族领袖”。直到今天，一些已经被各族人民打倒的民族反动派，还在宣扬什么“民族一家亲”等谬论，妄图抹煞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搞乱阶级阵线，破坏各族劳动人民的阶级团结，实现其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因此，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民族反动派借用“民族”名义进行欺骗宣传的伎俩，是团结各族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主体、民族利益的代表；剥削阶级不过是一小撮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根本不是民族的“主体”、“民族利益的代表”，更不是什么“民族领袖”。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针对蒋介石所谓“国民政府”的欺骗宣传，指出：“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

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正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粉碎了民族反动派的种种欺骗宣传。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毛主席才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救星。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清楚地说明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来是一个革命的问题。只有通过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直至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因此，把民族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对待民族问题，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观点。如果离开这个基本观点，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革命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正确认识民族问题，还必须充分注意各民族的特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毛主席强调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新民主主义论》）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原理和各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也是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同时也就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各族劳动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斗争中，各族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必然会越来越多，而各民族的差别性也就越来越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将长期存在，这也是民族发展的必然现象。因此，在对待我国民族问题时，还要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否则，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时充分注意各民族的特点。这就是说，一方面，各民族都要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共同的前进方向，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要求和做法上，又必须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少数民族的特点。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组织，遵循毛主席关于要“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的教导，充分依靠群众，注意调查研究，坚持与少

数民族人民商量办事的原则，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第三节 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了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之后，就不难理解，民族问题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压迫产生于阶级剥削制度，它是和社会总的革命问题相联系的，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时期，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消灭民族压迫，民族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问题不断扩大和尖锐。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集团不仅更加残酷地压迫本国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而且更加残暴地争夺和吞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把它们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样，民族问题就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世界范围的问题。

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宣告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终结，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期，民族问题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时期的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是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

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毛主席指出,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新民主主义论》)



畲族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以后,必须把民族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铲除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同时粉碎帝国主义和国内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才能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所以,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和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十分重视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时指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根据近百年来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给各族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相勾结，对我国各族人民的侵略和压迫，是各族人民遭受欺凌侮辱和贫困落后的根源，也是造成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歧视和纷争的根源。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各族人民的解放。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使我国各族人民摆脱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压迫和奴役。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最终目的而奋斗。民族问题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必须服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了党的基本纲领和党的最终目的，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在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了民族平等，不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我们党在民族工作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祖国统一，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做好党的民族工作，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现党的最终目的，努力奋斗。

第四节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世界观

在民族问题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本性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资产阶级只占本民族人口的极少数，为了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或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它垄断“民族”的名义，把本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千方百计地否认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为了实现它阶级剥削的私利，它宣扬民族有“优”“劣”之分，“优等”民族压迫“劣等”民族是天经地义的。它歧视和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侵略其他国家的民族，甚至用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把别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为了贯彻这种反动政策，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中散布民族歧视，制造民族纷争，破坏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所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是民族分裂政策，也是一种腐蚀各族人民革命

意识的政策。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由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本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无产阶级认为，全世界各民族，只有大小之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根本不存在“优等”“劣等”的区别。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民族不论大小，都应该是一律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压迫，完全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造成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之间的任何歧视和压迫，坚持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团结。由于资本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压迫不只是一个国家范围，而是国际性质的，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面对的敌人不只是一个国家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是世界范围的资本家国际联盟。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共同的斗争。无产阶级不实行国际团结就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只是主张各民族平等，而且主张“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战胜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有力武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的伟大战斗号令。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

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再指出,对民族主义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应把进步的民族主义同反动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根据这种区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高山族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只要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不管他们的领导集团和参加者是何种阶级、党派和个人,也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民族主义都是进步的。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对于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互相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联盟的民族主义,不管他们的领导集团打着什么旗号,都是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都是反动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至于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叛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破坏民族解放运动,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坚决揭露和彻底批判。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不应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当然,对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也要进行具体分析,

也就是说,要看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家。

在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为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既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国际主义的表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神圣义务。因为,只有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而实现了自己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就是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种“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所以,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来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一再教育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至于帝国主义殖民国家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所谓“爱国主义”。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他们应该是战争失败主义者,应该用一切方法使本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归于失败,而且失败得越彻底越好。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本

国人民的。只有“本国”和“本民族”的帝国主义者削弱了，失败了，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条件。他们只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人，也应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不但是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而支援世界上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由侗、瑶、壮、汉等民族干部组成的老、中、青三结合县委、县革委领导同志，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争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增强了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可以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同时，我们党一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我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努力奋斗。

在国内，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第三章

党的民族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时也为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党的民族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它正确地处理了我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各族人民加强革命团结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各族人民团结战斗，争取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团结。在民族问题上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由无产阶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

历史使命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最受压迫的阶级，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最终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团结力量，才能实现这个最终目的。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只有各民族的平等，才能有各民族的团结。而资产阶级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要挑起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互相猜忌和敌对，蓄意分裂它们之间的团结。所以，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列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并把它作为制定党的各项具体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毛主席一贯强调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对于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多次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坚决主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一再教育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努力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了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终



拉祜族

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主席又十分强调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意义，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

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再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为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而努力。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保障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颁布了各项政策法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并且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一重要精神，在一九四九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都作了明确规定。正是根据这一规定精神，党和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法令，禁止对少数民族人民带歧视和侮辱性的一切不尊重的言语、文字与行为。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肃清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安置流散的少数民族人民，发放救济款，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医疗卫生，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解决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疾苦等等一系列工作。并且积极帮助调解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由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一些兄弟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使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只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

全国各民族人民才能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真正享受到平等团结的温暖。

为了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新中国一成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中央和地方多次派出民族访问团、慰问团、工作团，到少数民族地区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人民也纷纷组织代表团、参观团到首都向毛主席致敬，或者到祖国内地参观学习。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各族人民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认识，增进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也加深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我们党和政府还向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进行了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并多次检查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以保证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到贯彻和落实。

切实保证各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和地位，是保障民族平等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问题。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人口都比较少。为了使各族人民都能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党和国家在确定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时，都超过了它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的比例。如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五十四个少数民族，包括人口最少的赫哲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也都有适当的规定。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凡是有条件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先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对散居

和杂居在汉族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这部分少数民族人民，党和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门颁布了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政策法令。这就使少数民族人民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实现了各族人民世代代渴望的、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愿望。



水 族

要巩固民族平等和加强民族团结，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可靠基础。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与汉族地区同时或稍晚一些时间，都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阶级剥削制度。从此，使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民族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把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保障民族平等和巩固民族团结，还必须逐步消除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后进状态，才能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获得巩固和发展。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建国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仅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逐步缩小了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不断巩

固了民族团结。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并肩战斗，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亲密合作，到处呈现出民族团结的动人景象。曾经在历史上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苦难的、有着共同命运的我国各族人民，更加感受到在祖国统一大家庭中的革命温暖，看到幸福的前景。他们衷心拥护党和毛主席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纵情歌唱：“毛主席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开放出民族团结的鲜花。”



湖南独坡公社和贵州新化公社的社队各族干部
在畅谈抓革命促生产的体会

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和亲密的团结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保证。正因为如此，国内外阶级敌人一贯把分裂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作为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国内各民族的反动派和刘少奇、林彪一伙，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进行了种种的阴谋破坏活动。但是，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反动力量所破坏不了的。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伟大力量面前，他们只能遭到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广泛、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林彪搞分裂，搞复辟倒退、投降卖国的罪行，批判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破坏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妄图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罪行。各族人民经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大为提高，更进一步提高了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他们说：“吃过分裂苦头的民族，最珍惜民族团结，受过压迫剥削的奴隶最热爱社会主义。”全国各族人民坚决遵循毛主席“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教导，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讲有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话，做有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事，和一切违反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现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更加巩固，各族人民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乘胜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二节 继续贯彻民族区域自治

毛主席早就指出：“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论联合政府》）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下，长期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不平等地位，丝毫没有政治权利。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为在政治上实现全国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保障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内实行的。宪法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关，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它标志着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过去毫无政治权利的地位和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除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

职权外，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享受自治权，宪法还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东乡族

我国现有的民族自治地方，有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相当于地区一级的自治州，和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县或自治旗。为了区别于我国一般的地方行政单位，凡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除了都注明有“自治”两字外，一般都还冠以地方和实行区域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的名字。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其他自治州、自治县或自治旗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至于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因地方名称已足以反映当地的主体民族名称，因此不需要特别注明，人们也能看出当地实行区域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就是蒙古族和藏族。

在全国五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区中，内蒙古地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宣布成立了自治区，它是我国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正确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致电祝贺，对内蒙古的广大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政府又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先后批准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此外，党和政府还在全国各地，先后批准成立了二十九个自治州，和六十九个自治县或自治旗（见附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简表》）。

从自治地方的民族组成情况看，全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等；第二种是以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几个人口较少、行政级别也较低的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而建立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虽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自治区，但在自治区境内又有好几个非维吾尔族的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州和自治县；第三种是由几个少数民族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等。而且，同一个少数民族，它也可以在全国好几个地区分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自治地方，例如藏族，除西藏自治区外，在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就又有藏族自治州、藏族自治县；回族、蒙古族等，也都有类似情况。总之，党和国家主要是根据我国各个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历史关系和经济条件等具体状况，在民族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才决定建立哪种类型的自治地方。

民族区域自治，是无产阶级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列宁说：“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非常明显，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具有比较大的特点以及具有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享受这种自治，那就不可能设想有现代的真正民主的国家。”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斯大林也说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因此,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完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政策。



纳西族

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个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早已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早已结成为一个整体。近百多年来,我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之下,这种共同的命运,又把我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地联系起来。而长期来共同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使我国各族人民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各族人民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才能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才能保卫和发展我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从民族分布状况来看,不仅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一起,而且大多数少数民族也交错杂居,还有些民族又分别聚居在好几个地方。这种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况,也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才能使各民族的人民充分享受到平等自治的权利,有利于发挥各族人民共

同建设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上述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说明，正是我国历史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在统一的祖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条件，而革命的发展又奠定了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总之，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它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愿望。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和贯彻，实现了有一定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的自治权利，增强了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大大推动了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都是我们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胜利。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国外，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了分裂我们祖国的统一，对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曾经进行了种种攻击破坏活动；在国内，各民族内部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断进行罪恶的分裂活动。特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从多方面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恶毒污蔑和攻击，千方百计地干扰和破坏我们党的这一民族政策。但是，不管国内外阶级敌人如何攻击和破坏，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都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它们的阴谋破坏活动，坚持贯彻和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而制定的一项长期政策，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继续贯彻党的这一民族政策而斗争。



景颇族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简表

(截至1972年12月31日止)

一、自治区：

名称：	建立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	1947.5.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5.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58.3.15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58.10.25
西藏自治区	1965.9.1

二、自治州：

名称：	建立时间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952.9.3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1953.10.1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1956.11.15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1952.2.12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53.12.15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953.12.22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1953.12.31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1954.1.1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1954.1.25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954.11.29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954.6.23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954.7.14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1954.7.15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1954.7.15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57.9.2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1952.7.1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1950.12.25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1952.10.1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	1953.1.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956.7.23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956.8.8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1953.1.24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1953.7.2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1954.8.23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1956.11.22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1957.9.13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957.11.18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1958.4.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1958.4.15

三、自治县(旗):

- 黑龙江省鄂伦春族自治旗
-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自治旗
- 黑龙江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 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
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
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
四川省盐源彝族自治县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省望谟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贵州省册亨布依族自治县
贵州省安隆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省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

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
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
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
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
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
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

第三节 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毛主席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教导，深刻地指明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从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高度，也就是要从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来认识积极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和本民族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易于理解本民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他们土生土长，具有本地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在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具体实践中，容易和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结合起来。这就更有利于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广大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

革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是一项艰巨任务。除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大力支援外,最重要的是依靠发挥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批地把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就更能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内部的积极因素,加速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还要有大批建设人材,如工业、农业、牧业、医务、教育、文艺工作者等方面的本民族出身的专业人员。少数民族人民说得好:“万马奔腾,头马先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有好的带头人。”

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对于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边疆有重要作用。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在祖国边疆,培养起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他们联系、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才能更有效地筑成反帝反修的铜墙铁壁,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统一。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这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而是要经过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到的。因此,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们党是一贯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党成立不久,就在少数民族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又在蒙古族、回族、壮族及其他民族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又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经过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又在这些地区传播了共产主义影响，播下了革命种子，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党又培养选拔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当时，党在延安创办的民族学院，就曾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专门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少数民族人民进行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又培养了不少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批批少数民族干部，都是党领导和团结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



柯尔克孜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即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普遍而大量地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更保证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顺利前进。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都强调指出，要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为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得到空前的壮大。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党

始终把思想建设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首要任务，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少数民族干部。各级党组织根据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结合形势和任务，经常组织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且组织他们联系旧社会血泪斑斑的民族史、村史和家史，对比解放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巨大变化，提高他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使他们进一步认



新疆帕哈太克里公社党委成员重温毛主席光辉指示，
决心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识到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经过学习，还进一步划清了无产阶级民族观和资产阶级民族观、无神论和有神论、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界限；加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观念；认识到少数民族干部不仅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本民族人民服务，而且要为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谋利益，从而提高了他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选拔优秀人才，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根本途径。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通过历次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斗争，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牧)、翻身农奴和翻身奴隶中选拔了大批优秀分子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这些新干部在革命斗争中产生，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增长才干。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是最经得起风险的，哈尼族人民说得好：“雄鹰只有和暴风雨搏斗，才能练硬翅膀；干部只有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考验，才会变得坚强。”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从解放初期开始，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大都创设了民族院校，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各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创办了许多“五·七”干校和各种学习班、读书班。民族院校、“五·七”干校给少数民族干部创造了学习进修的良好条件，这对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特别对处在地区辽阔、人口稀少的边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文化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是培养少数民族干

部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组织，就是经常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党员五个“必须做到”，教育共青团员、非党积极分子和干部，以便把他们提高到党员的水平，并积极慎重地把具备入党条件的吸收到党内来，让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现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已经普遍建立，并且在不断发展和壮大。

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党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都已积极培养，选拔了大批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新提拔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对新鲜事物感觉敏锐，敢闯敢干，勇于革新，他们在老干部的言传身教帮助下，认真看书学习，站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挑重担，边干边学，逐步提高。老干部在青年干部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影响下，也进一步焕发了革命青春。实践经验证明，实行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壮大，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中，一贯注意从少数民族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解放以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缓慢，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没有学习文化的可能。加上统治阶级蓄意提倡的宗教迷信和某些落后风俗习惯的影响，又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他们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根据这一历史形成的实际情况，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都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相应的措

施。对他们既满腔热情，积极教育；又实事求是，不对他们有不适当的过高和过急的要求。同时，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文化水平低，给予学习的机会；工作中出现困难，积极帮助解决；出现缺点错误时，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多为他们承担责任，并满腔热情地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使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得到迅速健康的成长。



土 族

党在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一贯强调必须加强各民族干部间，特别是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间的团结。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在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还培养了适当数量的汉族干部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帮助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加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是增强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党一贯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坚决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学习兄弟民族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尊重兄弟民族干部的意见和职权，支持和帮助兄弟民族干部搞好工作。同时，我们党也教育少数民族干部要防止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欢迎汉族干部，热情支持汉族干部，同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党的教育下，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热忱欢迎汉族干部，帮助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熟悉少数民族情况，照顾汉族干部的生活习惯。而汉族干部也充满革命豪情，克服语言上的隔阂和生活习惯上的困难，他们以高山边疆

为家，以艰苦为荣，忠心耿耿，为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服务，虚心向少数民族人民学习。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了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的信心和拥护。

在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干部大量地迅速地成长，而修正主义路线却破坏和干扰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刘少奇、林彪一伙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和孔孟之道，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少数民族干部，分裂各民族干部的团结。所以，在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也必须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以肃清其流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现在我国已经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既有经过多年锻炼的老干部，又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大批新干部，老中青三结合，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而共同斗争。

第四节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



达斡尔族

建国初期，我国各少数民族还分别保持着封建地主经济、农奴制经济和奴隶制经济等剥削制度。这些反动的社会制度，是少数民族社会千百年来停滞不前、人民贫穷困苦根源。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使

广大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赶上新中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积极支持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曾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取得了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更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废除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的社会制度，使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从本民族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并进一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首先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斗争。

少数民族社会制度的民主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一部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来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也是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任务，具体说来，在农业区是废除地主、农奴主、奴隶主的土地占有制及农奴主、奴隶主对农奴、奴隶的占有制，解放农奴和奴隶；在牧区，主要是废除封建

牧主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同时，废除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也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地区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又比较复杂，因此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斗争中，充分注意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和办法，坚决贯彻了党的路线和政策。

解放初期，我们党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艰苦的工作，如：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启发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觉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的上层爱国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等等。而且，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开展民主改革准备了条件。

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壮族地区、朝鲜族地区、回族地区、蒙古族的农业区、维吾尔族地区等，在民主改革前，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对这类地区的改革，基本上采取了同汉族地区土地改革大致相同的做法。在一部分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宗教问题比较复杂的地区，如傣族、彝族、藏族等地区，则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剥削阶级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中拥护社会改革，愿意接受改造的上层爱国人士，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顽固抗拒改革的敌人，以利于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

至于少数民族牧区的民主改革，因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生产，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时，根据牧区的特点，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和步骤，废除了反动的剥削压迫制度，发展了

牧业生产,改善了牧民生活。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原来有数以万计的各种宗教寺庙。这些寺庙占有大量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寺庙的统治者还有许多封建特权,不仅在思想上欺骗愚弄人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有的寺庙甚至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阴谋破坏活动,以至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据点。因此在民主改革时,广大群众都迫切要求废除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在这一斗争中,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全面贯彻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严格把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封建剥削制度同人们的宗教信仰加以区别;把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加以区别;并且狠狠地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这样,既团结了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又争取团结了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孤立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取得了废除宗教寺庙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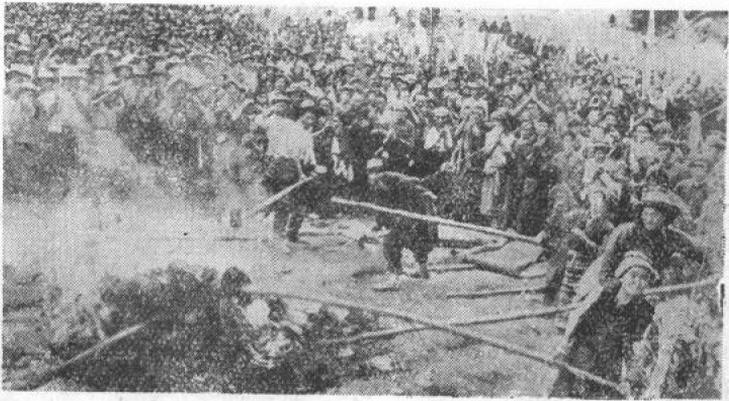


佤族

经过上述一系列艰巨斗争,先后完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任务。

一切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曾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有的甚至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党采取了“有反必肃”和“有叛必平”的方针。坚决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平息叛乱,才使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还曾遭到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他们站在少数民族中的反



一九五九年，西藏民主改革的革命烈火，烧尽三大领主
残酷压迫和剥削农奴的一切契约和高利贷借据

动阶级立场上，反对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甚至为反动的民族、宗教上层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辩护。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组织排除了刘少奇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干扰，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支持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胜利地完成了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任务。

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废除了千百年来压在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头上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剥削制度，使世代受剥削受奴役的奴隶、农奴获得了解放，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普遍发展。各族人民通过共同的斗争，增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胜利，都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各族人民怀着翻身后无比喜悦的心情，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的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一封长诗形式的致敬信中写道：

“在您的伟大时代里，
我们解放了的农民，
从帕哈太克里，
向您致敬，毛主席！”

“是您，把我们解放，
您早就把我们惦记。
您领导的共产党，
为我们谋福利，
使无数的穷苦人，
不再受人欺。

“是您，我们英明的领袖，
指引我们夺得了胜利。
您灿烂的光芒，
撒满花园般的大地。

“如今我们扬眉吐气，
快乐的歌声震动大地，
啊，伟大的领袖，
我们对您一百个满意。

“您缔造的新社会，
使我们无比幸福，
我们的领袖和导师，
祝您万岁，万万岁！”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取得翻身解放的衷心拥护和无限感激的心情。

毛主席在复帕哈太克里乡的翻身农民的回信中说：“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毛主席的复信，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革命的斗志和信心。

民主改革完成以后，我国少数民族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的道路不断前进，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伟大胜利。

少数民族地区在完成了民主改革以后，还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私有制：一种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的私有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早在一九五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灯塔。

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少数民族广大人民对两种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在我国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三千万人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党在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引导民主改

革后的广大少数民族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逐步克服了单干户不能克服的人力、畜力、种子等困难。先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使少数民族广大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在这个基础上，再由互助组扩大到以土地入股、按比例分红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后过渡到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合作社。



羌 族

在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族人民还自动打破了民族界限，组织了由几个民族联合在一起的民族联合社。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贡献力量，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和友爱精神。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有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和裕固等民族，约三百万人。党在领导少数民族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根据民主改革后牧区的特点，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和步骤，慎重地、逐步地完成了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由于情况特殊，是超越了几个社会阶段，直接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如四川的彝族地区，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大力帮助下，在废除了奴隶制后，通过合作化运动，越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至于在阶级已开始分化，但仍保留有原始公社残余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傈僳、景颇、独龙、崩龙、布朗、佤、怒、黎、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族地区，则没有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

而是在剿匪平乱、安定社会秩序，帮助建立革命政权，开办学校，无偿发放生产资料，帮助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逐步把这些少数民族人民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在解放后的短时期内，也是越过了几个社会阶段，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

在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在一些少数民族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被打倒的地主、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和反动的山官、头人以及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刘少奇曾恶毒诬蔑“少数民族不能办合作社”。对于这种恶毒诬蔑，毛主席曾严厉指出：“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一伙的恶毒诬蔑，同时也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少数民族农、牧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组织，坚决贯彻了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路线，树立了贫下中农（牧）的优势，坚定地团结中农（牧），批判和克服了少数富裕农（牧）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发展。除西藏外，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农、牧业的合作化。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在一九六〇年完成民主改革后，积极慎重地开展起来的。

少数民族地区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和以后，也都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个体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飞跃，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这一变革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春，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少数民族中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也迫不及待地参加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反对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领导，反对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恶毒攻击农、牧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反对合作化运动。对于少数民族中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义愤。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和干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一切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且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着重反对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通过“是社会主义还是

民族主义？”的群众性大辩论，终于胜利地击退了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

整风反右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少数民族农、牧民社会主义觉悟大为提高，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一九五八年初，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鼓舞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局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势下，毛主席向各族人民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农、牧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已实现农、牧业合作化的地区，同汉族地区一样，于一九五八年普遍办起了人民公社。在还没有实现合作化的地区，也在以后分批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加速了农村和牧区资本主义势力的衰亡，进一步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各族人民无比热爱人民公社。蒙古族人民把它称作是“通天的虹桥”，柯尔克孜族人民欢呼：“跨上了人民公社骏马，一日千里地奔向共产主义前程。”

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阶级敌人的反抗，他们连做梦都在想着复辟资本主义。在我国国民经济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并在农村和牧区煽起了一股“三自一包”的黑风。一时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小撮反动的王公、贵族、农奴主、奴隶

主和反动宗教上层也跳出来反对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诬蔑社会改革，进行反攻倒算，实行阶级报复，妄图复辟旧制度。某些少数民族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甚至与帝、修、反相勾结，进行反革命的叛国活动。



布朗族

面对这种情势，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致，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了困难，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使工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还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苏修叛徒集团在我国新疆等边疆地区进行颠覆破坏和策划反革命叛乱的罪恶活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西藏地区的军事入侵，大长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保卫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正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一九六二年秋，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击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复辟活动，打击了甘心为帝、修、反效劳，出卖祖国，与人民为敌的民族反动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高

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摧毁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深入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极大地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继续胜利前进。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怀少数民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引导少数民族地区广大人民和干部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少数民族广大人民夺回了被刘少奇一类骗子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建立并巩固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广大群众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排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对党的民族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狠狠打击了民族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之间更加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也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大革命。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荡涤了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伟大胜利，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的贯彻，巩固和发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不断发展。

上述一切，充分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

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广大少数民族人民都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好得很！”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批判了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了孔孟之道。他们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对比，更加认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说得好：“比比过去，看看现在，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想想过去，看看今天，越想越觉得社会主义美好，越看越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深远。”

撒拉族

二十多年来，少数民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一系列斗争，深刻地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通过二十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少数民族人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并不是斗争的结束，只有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少数民族广大劳

动人民，回顾历史，心明眼亮，展望未来，斗志更旺，正在为争取新的胜利而斗争。

第五节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制度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系列胜利，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上，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在支持少数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一贯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把它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统一的整体，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发展工业、农业、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巨大潜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农业、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而全

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有重大意义。



在旧中国,地域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什么现代工业企业。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只集中在沿海几个城市的畸形状态,使我国的工业得到合理布局,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地、健康地发展。

毛 难 族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祖国边疆、处于反帝、反修的国防前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边疆地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高边疆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有利于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巩固祖国国防,加强反帝、反修斗争。

总之,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推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民族平等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祖国统一,都是十分必要的。

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广大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获得解放和发展。建国以后,毛主席在和少数民族人士的谈话中,又多次指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人口,发展经济、文化,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我们党的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在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和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中,再次规定,国家机关要“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帮

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规定的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要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抓紧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革命主动精神，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实践证明，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中，首先要充分调动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但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积极支持少数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示，在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指引下，党和国家，从实际出发，具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政策和措施。

多年来，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根据国家的可能条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大力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解放后，党和国家派遣了大批干部和工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本民族干部团结在一起，带领各族人民为开发和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而积极工作。最近几年来，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批批奔赴祖国的广大农村、牧区、边疆插队落户干革命。在贫下中农（牧）的教育下，不断成长壮大，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党和国家还一贯指示驻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的子弟兵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一面执行战备任务，保卫边疆；一面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建设边疆，为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和民族团结，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了贡献。

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进度，党和国家还在财力、物力和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照顾。建国以来，国家每年都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巨额财政补助，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供应上也给以优先照顾，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得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向前发展。在商业工作上，除不断合理调整工、农（牧）业产品的比价外，商业部门又根据少数民族人民的习惯，积极做好少数民族人民特

需商品的供应工作。这些政策措施,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党和国家还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党和国家拨出大量经费,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防疫站、医院、医药商店,并对一部分少数民族实行免费医疗。这就大大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卫生条件,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另外,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学校,对一些边远山区的中、小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为了加速培养少数民族的革命和建设人材,国家除在中央和一部分民族地区设立民族院校外,还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时,放宽对少数民族学员入学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并优先录取。对在职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医务人员、教师等,给以优先进修的机会,积极帮助他们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从而使少数民族出身的各种人材不断成批涌现。

建国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由于坚持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并且不断排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这才保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得以较快地发展。那些林立高原、山地或草原、平坝上的现代化工矿企业;那些纵横交错,贯穿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线;那些斩江截流,迫使滚滚洪流转化为电能的大型水利工程;那些遍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村村寨寨的学校、医院等文化设施,一个个、一批批地建成,这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一些规模宏大的建设项目的胜利完成,更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生动体现。特别是那些单

靠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力、物力无法办到的铁路、大型工矿、大型水利工程等，就都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之下，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大力支持和帮助才建成的。例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全国就有三十二个大、中城市支援了大量的人力和器材，才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仡佬族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在积极支持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历来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去考虑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并按照国家统一计划，根据需求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无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不积极支持和帮助，或者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可能条件，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都是对整个国家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的。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发展农业、牧业和工业。不仅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各种土特产品，而且还向国家直接提供许多工业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巩固了国

防,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第六节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语言文字是人们进行日常联系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工具,也是继承、传播和发展人类文化知识的工具。共同的语言是每个民族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的种类很多,有的通用汉语。一部分少数民族还有自己比较通用的、与本民族语言相一致的民族文字;一部分少数民族通用汉文。

民族语言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是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在民族问题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原则问题之一。我们党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历来就是如宪法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每个民族自由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是各族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利。不论哪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应当尊重,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字加以歧视。

解放前,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民族压迫制度,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语言文字方面也一贯受到反动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种种歧视和摧残。从孔孟之流到人民公敌蒋介石,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都进行了恶毒攻击和诬蔑。孟轲曾谩骂、侮辱少数民族是什么“南蛮鴟舌之人”(把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比

作恶鸟的声音)。国民党反动派也咒骂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什么“蛮语黑话”、“兽言鸟语”，并且还采取拘捕罚款等手段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帝国主义则一直利用语言文字问题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国内外反动派这种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歧视、限制，加深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解放前是根本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锡伯族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我们党和政府在对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上，历来是坚持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应被尊重。并说：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

认真贯彻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对于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障民族平等和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不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工作，这不仅是对当地民族的不够尊重，而且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因为听不懂，看不懂，也就无法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也就不可能达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目的。这就必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习

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就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各民族自治地方还根据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按照当地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作出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规定：自治区级各单位发文必须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各自治州、自治县行文必须有自治地方少数民族通用的文字，开会要进行翻译，要重视各民族文字读物的出版工作，等等。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也都有类似的措施。

为了保证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党和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解放不久，我们党和政府就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并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坚持各民族自愿和有利于本民族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曾帮助一些原来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文字。还帮助一些民族对本民族原有的文字进行了改革。对经过改革后的民族文字，在推行工作中，也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防止新老文字脱节的现象。而且在推行时，还根据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坚持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经过这样的创制或改革，推行或试行的结果，一般说来，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全面推行的、以拉丁字母代替原来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这两种新文字，就受到了这两个民族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普遍认为新文字的好处很多：容易学；字母简单，容易写；有利于再学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语文；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互相学习；也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科学技术的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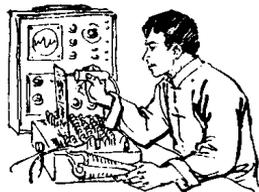
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编译出版工作，也是贯彻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措施。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文字的编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马列著作和我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的大量编译出版，更符合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迫切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愿望，意义非常重大。早在一九五六年底，《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文版即已出齐。少数民族人民高兴地说：“毛主席的书是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的金书，是一把万能的金钥匙！”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少数民族文字读物的出版工作，更加欣欣向荣。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有关重要指示、文件的及时翻译；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少数民族文学书籍的大量编译发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作品的大量发行；中央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广泛使用。所有这些，都是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积极贯彻的具体体现。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它是保证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同时，我们也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文字。我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和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我国各族人民也早就有了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传统。解放以来，随着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不断加强，和祖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各族人民更愈来愈感到

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汉语文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文字，它丰富地记载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祖国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少数民族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亲身的经历，深刻地体会到，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汉语文。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驻守在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上山下乡、参加边疆建设的广大知识青年和汉族工人，也从亲身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学习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同当地各族革命干部、革命人民更好地密切合作，共同生产、共同战斗，也需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不仅可以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加强祖国统一、更有利于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同时还可以丰富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因此，对于我国各族人民这种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迫切要求和愿望，我们都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只能根据自愿原则，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我国各民族不仅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还出现了好多互相学习民族语言文字的动人情景。例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蒙古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干部，即大多已学会使用蒙古语，而绝大多数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也都能使用汉语汉文。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担任公社以上领导职务的外来干部，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当地傈僳、怒、独



阿昌族

龙等族语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各族人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已蔚然成风。通过这种互相学习，即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政策能够更加迅速

广泛地为各族广大人民所了解和接受，同时也使各族人民能更好地交流思想，共同开展三大革命运动。这对于各族人民更积极自觉地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起着重要作用。

二十多年来，由于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胜利贯彻，我国各民族已都充分享受到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但是在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并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林彪一伙，他们用各种手段疯狂反对党的这项正确政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们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也是极尽破坏、诬蔑和攻击之能事。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些罪恶活动，一次又一次地被紧密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所粉碎，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也已经和正在继续不断地取得辉煌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还会长期存在，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内外敌人还会利用民族语言文字问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想借以达到重新奴役我国各族人民的罪恶目的。因此，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重申“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阴谋在民族语言文字问题

上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一个有力的回击。我们必须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决反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对这项政策的破坏活动，彻底肃清刘少奇、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为继续贯彻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正确政策而努力。

第七节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民族的风俗习惯，指的是各民族人民群众在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等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喜爱、风气、习尚和禁忌等的总称。它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而逐步形成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和表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历史、经济、文化生活和心理感情的；有些风俗习惯还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有些风俗习惯又直接间接地同宗教信仰有联系。民族风俗习惯，一方面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也在不断变化，而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它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的风俗习惯，反映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同时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下，曾经遭到歧视与侮辱。因此，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解放前就曾经指出：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被尊重。”（《论联合政府》）建国后，我们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平



塔吉克族

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一贯坚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的政策。教育各族人民相互尊重民族的习惯，即使对于某些需要改革甚至废除的陈规陋习，也是通过不断宣传教育，启发和引导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自觉地去改革和摒弃，决不允许强迫干涉，包办代替。党的这一民族政策，得到了全国各民族广大人民的拥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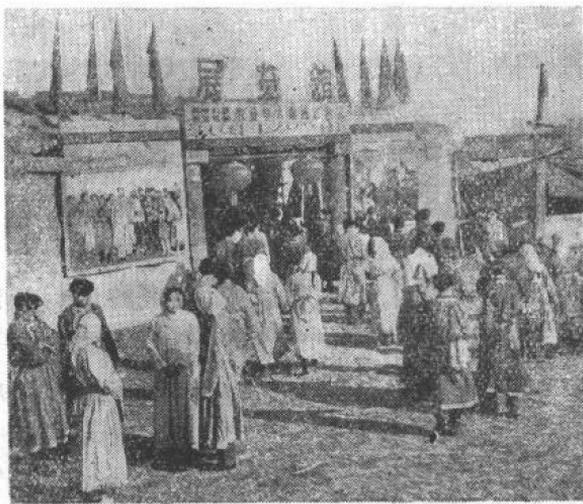
在党的这一政策指导下，二十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各民族都在本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一些不利于民族进步的风俗习惯，慎重地、逐步地、积极地进行了改革。例如过去在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中存在的杀牛祭谷、妇女不犁田、不落夫家（婚后女方仍回娘家，要等怀孕生下子女后才许住在夫家）、买卖婚姻、佩戴笨重饰物、不用人粪作肥料、规定一年中某些日子不能下田生产等等，大都已先后进行了改革。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如溺婴、赶琵琶鬼等，在解放初期，就已为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所革除。就是某些至今尚保持的民族风俗习惯，各民族也大都根据本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充实和革新。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些风俗习惯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还具有深刻的影响。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蒙古语“娱乐”的意思）大会，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白族等的“火把节”等。

“那达慕”大会在蒙古族中已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本来

这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蒙古族劳动人民一年一度的群众性集会。会上有摔跤、赛马、射箭、歌舞以及集市等活动。但是，解放前在一个很长时期中，由于内蒙古封建王爷贵族的把持，“那达慕”大会实际上已成了这一小撮反动剥削阶级恣意享乐，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受压迫、受剥削的一项活动。解放以后，废除了封建制度，废除了封建剥削阶级对“那达慕”大会的把持，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根据蒙古族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那达慕”大会这个古老的群众性集会，被赋予了不少积极的、新的内容和意义。现在，每当七、八月间，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区以下的盟、旗，都举行规模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时正是内蒙古草原丰收的季节，蒙古族人民除了在会上举行各种传统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外，还有计划地进行物资交流，结合农、牧业生产，进行政治、文教、卫生宣传，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并召开庆丰收大会，选举劳动模范、交流生产经验。为了支持和满足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各级有关部门还在大会期间组织开展集市贸易，大量收购土特产和进行生产及生活资料的交流，从而使蒙古族人民的这个传统节日，一年比一年丰富多采、朝气蓬勃。

“泼水节”，在我国傣族人民中，也已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对于这个节日的来源，在广大傣族劳动人民中有这样的传说：在很久以前，傣族地区有个凶恶的魔王，一贯压迫、掠夺广大傣族劳动人民。有一次，他又掳掠了七个傣族农村妇女，由于这七个妇女的英勇抗击，终于把这个魔王杀死，为广大傣族劳动人民除了一个大害。人民为了感谢她们，给她们冲洗身上的血污，就纷纷把清水泼在她们身上。从此，每年逢这一天，为了纪念这七个英勇的农村妇女，傣族人民就把它固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各族牧民在“那达慕”大会上参观牧业学大寨的展览

定为“泼水节”。这个传说反映了广大傣族人民坚决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勇斗争精神。因为“泼水节”是在每年农历清明前后的傣历新年举行，所以这个节日就近似汉族的春节。过去，每逢“泼水节”，傣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用相互泼水来表示，要把过去一年中的贫困和病疫冲刷干净，预祝在新的一年里人畜两旺，五谷丰收。节日里还放鞭炮、赛龙舟。有些受宗教迷信影响较深的人，还进行拜佛、祭祖活动。但是在旧中国反动阶级统治之下，尽管傣族人民年年举行“泼水节”，但广大劳动人民的那种美好愿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解放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傣族人民才和全国各族劳动人民一样，真正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生产和生活都一年比一年提高。因此，现在傣族人民的“泼水节”实际上已

成了广大劳动人民庆贺过去一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预祝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胜利的欢乐的节日。为了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节日里，欢乐的人群总是首先把一盆盆清洁的水泼向东方，遥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再与当地兄弟民族的人民、驻守在那里的解放军相互泼水，互致祝贺。此外，广大傣族劳动人民，特别是一些青年、民兵，还和当地各族青年、民兵及解放军开展游泳、划船和各项联欢活动，使整个“泼水节”到处都洋溢着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欢乐景象。至于原来那些宗教迷信活动，则早已为广大群众所革除。

“火把节”，是我国彝族和白族等共有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有悠久的历史。对于这个节日，在两族人民中，有这样两种传说。一说是古时在彝族和白族等地区有个无恶不作的土司，一贯对当地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了反抗他的罪恶统治，于某一年的六月二十四日晚上，用几千只山羊，在羊角上缚上火把，驱羊前进，围攻土司，终于取得了胜利。以后每逢这一天，两族人民就都要举行盛大的“火把节”，以纪念这次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胜利。另一说是每年农历六月下旬，正是庄稼生长和害虫繁殖季节，为了消灭虫害，男女老少同去田间察看禾苗，规定每年从六月二十四日起，一连三天，在晚上人人拿着火把，到田头检查庄稼。这两种不同的传说，都反映了这些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关心生产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解放二十多年来，随着革命和生产的迅速发展，“火把节”的内容也更充实了。现在每逢节日，白天各族劳动人民都欢聚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和生产经验，畅谈各自对三大革命运动的体会，并且开展各种体育文娱活动。一到晚上，又在群山

上燃起数不清的火把，载歌载舞进行联欢活动。这时，歌声、器乐声、欢乐声响彻云霄。山鸣谷应，到处都汇成一片片欢乐的海洋。



怒 族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民族政策。解放以来，我国各族人民一贯坚持执行了这一政策，这对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在不断变革中。今后我们仍然要继续注意贯彻这一政策，克服那些在对待民族风俗习惯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对于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改革旧风俗旧习惯进行干扰和破坏的罪行，则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进行斗争，以争取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而不断努力。

第八节 正确对待少数民族 中的宗教信仰

解放前，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曾经长期流传各种宗教。有些少数民族中一些人信仰伊斯兰教，有些少数民族中一些人信仰喇嘛教。在有的少数民族中，也有人信仰小乘佛教或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其他宗教。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还保留有原始的多神崇拜。在这些信教群众比较多的少数民族中，宗教迷信不仅深入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而且还往往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纠缠在一起，从而使宗教信仰问

题在这些民族中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解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政治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宗教迷信观念在少数民族中已有很大的削弱。但是，由于宗教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已有较长时期的流传和影响，加之宗教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并未完全消除，所以在过去受宗教迷信影响较深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还有一些群众仍然受着宗教迷信的束缚。因此，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人民中的宗教信仰问题，正确执行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对于提高信教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党对待全国各族人民关于宗教信仰的政策。我们在对待少数民族中的宗教信仰问题时，也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精神，认真执行党的这一政策。

恩格斯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原始社会，人类因无法理解某些自然的、心理的、生理的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梦幻、疾病、生老、死亡等等。同时也无法摆脱诸如水灾、火灾等一类自然力量的侵袭。于是就产生了对自然物从恐惧到崇拜的观念，产生了体外存在着灵魂的观念，和其他各种迷信观念。幻想有超人间的力量——神灵、上帝在主宰一切，幻想祈求神灵、上帝能够帮助人们解除痛苦。所以，正如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

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反杜林论》)

随着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宗教又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维护他们的剥削特权,总是竭力扶植、利用人们的宗教迷信观念。他们炮制各种宗教教义,制定宗教教规,为本阶级的统治服务。他们把本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说成是神的意志,用“上帝”和“天命”威胁人们去忍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胡说什么顺从的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反抗的死后要到地狱受罚。他们还蒙骗人们去诵经祈祷,祈求来世的幸福,以此麻醉人们的反抗意志,要劳动人民安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命运。现在世界上的所谓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在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即奴隶和奴隶主这一时期才开始形成,并一直为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和以后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才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反动本质。

由于宗教具有极大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因此,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也都曾利用它作为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精神武器,而外国帝国主义也利用它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之一。

在我国,过去喇嘛教(中国佛教的一派)在西藏等地区,伊斯兰教在西北等地区之所以如此流行,就是由于元、明、清王朝以至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扶植的结果。例如,解放前西藏地区政教的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就是始于元代

而后又经清王朝正式册封才流传下来的。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尽力扶植、支持和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西藏的广大劳动人民。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还利用伊斯兰教及其上层人物，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明、清两代的封建头子皇帝，都曾“诏谕天下”，保护伊斯兰教，并亲自下令“敕建”清真寺。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还规定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凡任命教主，事先都必须取得他们的反动政府同意。有些基层教主，还要与当地地主豪绅协商，才能批准任命。维吾尔族中的清真寺，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还设有宗教法庭，并向劳动人民摊派捐税。由此也可见宗教与反动统治阶级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那时，宗教势力、反动官府和地主豪绅就是这样三位一体，共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清王朝乾隆年间，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为了反抗清王朝的残酷压迫，掀起反清大起义。起义遭镇压以后，清王朝竟又下令西北地区的清真寺管束教民、保证教民以后不得“叛乱”。这样，当时西北地区的清真寺也就成为清王朝统治回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工具。

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有些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还用专制的手段，强迫劳动人民信仰宗教。如西藏的寺庙领主，过去就有这样规定：凡家有二、三子者，必须送一子为僧，家有二女者，必须送一女为尼。甚至无子女者，也要花很多钱找人代替支“扎差”（喇嘛差）。而对农奴来说，入寺为僧，只不过是世俗领主的魔掌里转移到寺庙领主的魔掌而已。在云南省傣族中，过去不仅小孩一生下来就必须请和尚取名，有的地区而且还规定男孩到六、七岁都必须送进佛寺去当几年和尚。少则三、五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不再还俗。再

如在伊斯兰教比较流行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有些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还利用某些教规，强制人们在幼年就要信仰宗教。宗教信仰，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已完全成了被强加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乌孜别克族

为了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还经常挑拨、唆使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头子进行教派斗争，这些宗教头子强迫信仰不同宗教或教派的群众参与械斗，酿成流血事件，结下血海深仇。

至于帝国主义者，他们为了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除了不断使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手段外，他们又同时总要利用各种宗教活动，作为实行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他们不仅派遣众多的传教士，深入我国各地，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强占土地房屋，建立教堂，创设教会，用威胁、诱骗等手段，逼使我国各族人民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不少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并且还是受帝国主义雇佣的间谍、特务。解放前，就如交通闭塞的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无孔不入地钻到那里，勾结彝族奴隶主，大肆进行传教布道活动，强迫、诱骗彝族人民信仰宗教。此外，一些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还在我国竭力利用和支持喇嘛教、伊斯兰教，为他们的侵略目的服务。

由此可见，过去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宗教迷信流毒之所以比较广泛，其原因，就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一贯支持、扶植与蓄意提倡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进行革命斗争，彻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直至最后消灭阶级，才能消灭宗教赖以存在的社

会根源。同时，只有当人们能够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并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控制种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就铲除了宗教在认识上的根源。因此，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在人们头脑里确立，无神论越来越多地占领阵地，宗教影响也必将愈来愈小，以至最后消亡。

我们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党坚决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坚决揭露剥削阶级利用宗教去压迫和剥削人民、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的伪善面目。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同宗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根本对立的。我们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把人们从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宗教思想却障碍、阻挠人们的革命觉悟。列宁说：“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为此，把信教的人民群众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削弱和克服人们宗教迷信观念的根本途径，是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引导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活动。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人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对宗教迷信观念的有力批判。我们要在三大革命运动过程中，广泛地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文化科学知识，使人们自觉起来同宗教迷信作斗争，同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指出，群众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

结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宗教信仰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精神世界问题。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毛主席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宪法规定的精神，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执行党对待宗教信仰的政策。我们既不能对于至今还在信仰宗教的人们，强制他们不信教，或者歧视他们；又要坚决反对宗教势力去强迫本来并不信教，或过去信过教而现在已不再信教的人们信教，也不允许复辟某些已被广大群众所抛弃了的宗教迷信活动。我们还应该经常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积极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这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忽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放弃无产阶级思想阵地，让宗教迷信泛滥。这是十分错误的。

建国以来，正是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对待群众宗教信仰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宗教迷信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了很大的破除。通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斗争，我们党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废除了封建的宗教剥削制度，使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在反动的宗教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向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进行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育。广泛宣传了文化科学知识，并组织他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狠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的“天才论”、“天命观”和



俄罗斯族

“上智下愚”等唯心主义观点，使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信教群众认清了宗教迷信观念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它的反动性，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和毒害。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响应“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大破“天命观”，不仅和妄图复辟的阶级敌人斗，也同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斗。他们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用种种科学办法抗旱、防洪，把“神山”踩在脚下，让“神水”供人使用。不少过去信教的群众，不再求神拜佛，不靠神和自然的赐予，树立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树立了《国际歌》中所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观点。



西藏隆子县列麦公社广大妇女打破陈规陋习，扶耜犁田

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爱国宗教人士，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是有利于贯彻宪法规定的党的宗教信仰的政策，也有利于团结教育至今还在信教的一部分群众，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当然，我们同爱国的宗教人士的团结，是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的团结。

毛主席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必须教育爱国宗教人士努力学习，加强改造，遵守政府法令，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且鼓励他们同宗教界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鄂温克族

我们必须看到，在少数民族中，一些残余的宗教势力因不甘心于宗教迷信观念的削弱，常常无视党和政府的政策，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或者强迫群众履行宗教仪式，或者利用宗教迷信干涉政府的文化教育，强迫儿童读经文，或者利用宗教迷信干涉婚姻自由、人民诉讼，甚至骗财害命，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侵犯公民权利、违反宪法规定、对抗党的政策的。因此，要使宪法规定的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得到贯彻，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对违法分子进行监督、批判和斗争，并取缔各种非法活动。

少数民族中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他们还经常污蔑歪曲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妄图利用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煽动群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一贯利用宗教作为它们进行侵略的工具之一。特别是苏修统治集团，更无耻地堕落到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其国内外反动政策的地步。在国内，他们大肆提倡宗教迷信活动，竭力进行反动的宗教宣传，胡说东正教“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利用宗教麻痹苏联人民的革命意志。对国外，他们打着“宗教”、“民族”的旗帜，以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他们通过广播、报刊等手段，进行反动宣传，诽谤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妄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

结，分裂我们祖国的统一。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全面贯彻党关于宗教信仰问题的政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坚决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利用宗教信仰问题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保卫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国内外阶级敌人惯用的一个共同手法，就是故意把“民族”和“宗教”混为一谈，以此来蒙骗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而事实上宗教与民族，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民族是一个人们的共同体。宗教不是民族的特征。信仰某一宗教不只是一个民族。例如，解放前，在我国就有十个民族中的一些群众信仰伊斯兰教。一个民族人民中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先后不同，如维吾尔族中信仰的宗教，原来是萨满教，以后又传入了摩尼教、佛教、火祆教，公元十世纪才开始传入伊斯兰教，直到十五世纪，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强迫下才信仰伊斯兰教。一个民族也有信仰各种不同宗教的，如解放前，在景颇族中，有些人信仰巫教，有些人信仰天主教。纳西族中，有些人信仰多宝教，有些人信仰喇嘛教。由此可见，民族和宗教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国内外反动派诽谤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蓄意把二者混淆起来，其罪恶目的就是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挑拨民族关系，阴谋复辟，对此，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揭露与驳斥。

第九节 团结、教育、改造 少数民族爱国人士

我国宪法指出：“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少数民族爱国人士,是少数民族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也是这个广泛的、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爱国人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它是为贯彻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坚持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并使他们本人也得到改造。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历来都是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注意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同时对爱国人士一贯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孤立民族反动派,我们党即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同少数民族中的爱国人士建立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空前团结,我们党又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对凡是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意社会改革,愿意接受改造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也仍然坚持了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在政治上给以安排,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多方面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改造工作。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而阶级斗争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必然反映到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工作中。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地贯彻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同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团结，是建立在一定政治基础之上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政治基础是反帝爱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个基础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文献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这六条政治标准，一方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应该遵照六条政治标准，努力改造自己，以便从两方面巩固这一团结。如果有人对抗改造，倒退复辟，那是必然要遭到人民的反对、被人民所唾弃的。

历史实践证明：党的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一政策，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中的大多数是能够不断接受改造、跟上时代前进的。对抗改造、对抗时代潮流、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只是极少数。

要继续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政策，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刘少奇、林彪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抹煞阶级斗争，破坏和干扰党的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政策。为此，我们必须不断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第四章

少数民族人民在 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阴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茁壮成长，农业、畜牧业、工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

第一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

建国以来的二十多年，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仅仅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促使这个巨大变化的力量是什么？在一支乌孜别克的民歌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毛主席著作是太阳，
照得祖国放金光，
条条战线传捷报，
山河大地换新装。”

各族人民从亲身经历的巨大变化中，深刻地体会到：“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广大翻身奴隶、翻身农奴和贫下中农（牧），如饥似渴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象灯塔一样指引着人们在社会主义航道上破浪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少数民族人民，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等唯心主义谬论，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少数民族人民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迅速掀起，正在逐步深入。各种类型的读书班、工农（牧）兵学习班和政治文化夜校、毛泽东思想巡回宣传队、地头读报组、业余文艺宣传队、阶级教育展览馆，以及生动活泼的家庭批判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和动人事迹，更是层出不穷。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还积极组织力量，把有关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翻译成民族文字，并在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上刊登，还制成民族语言录音播放，为广大贫下中农（牧）提供学习材料。党的统一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互里沟大队的
翻身奴隶在政治夜校学习

领导和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促进了各族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普及和深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以工农(牧)兵为主体的，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战斗的理论队伍，正在斗争中茁壮成长。理论战线上的这些新兵，多半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牧)或翻身奴隶、翻身农奴。他们冲破重重困难，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成为理论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他们活跃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坚持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坚持理论工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服务，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通过学习、批判和回忆对比，各族人民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各族人民更加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人们把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和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斗争上，充分表现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学了理论亮堂堂，
胸有朝阳手有枪，
朝阳照路枪打虎，
保我江山万年长。”

这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用诗歌形式歌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改造人们精神面貌的重大意义。我国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活动，历来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经过理论学习，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聚居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家家为哨所，人人当哨兵，严密注视着国外阶级敌人的动向。在我们伟大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铜墙铁壁。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族民兵，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携手，共同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挑拨我国民族关系，分裂以至颠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卑劣行径，表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尚品质。

和**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

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同样表现着高度的革命自觉性。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各族劳动人民，进一步地加深了对党的基本



崩龙族路线的理解。狼要吃人，披着羊皮的狼也要吃人。被打倒了的奴隶主、农奴主等剥削阶级要复辟，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钻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也要搞复辟，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妄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剥削人民，把各族劳动人民再次推向黑暗的深渊。从极野蛮、极反动、极落后的社会制度下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着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各族人民，对刘少奇、林彪的复辟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决心以实际行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为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而斗争。

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评论《水浒》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仍然有着滋生城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要消灭阶级，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专政。因此，各族劳动人民和广大干部，不断地开展对阶级敌人的主动进攻战，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资本主义妖风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种种罪恶活动。他们更加自觉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而鸣锣开道。为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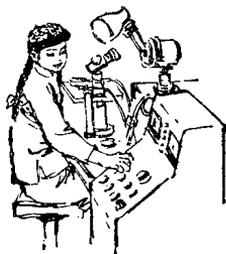
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去干，去革命，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赢得了思想上的飞跃，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打破旧的传统观念，铲除迷信思想和奴隶主义，不信“鬼神”不怕邪。他们胸怀共产主义革命大目标，敢想、敢干、敢革命。他们坚持自力更生，大搞群众运动，战胜了自然界的各种困难，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各种干扰和破坏，迅速改变着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

西藏自治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隆子县列麦公社的社员说得好：“民主改革以来，国家在物资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单纯地等、靠、要，这是不对的。只有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二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正是在这个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之下，夺得了一个个的伟大胜利。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各族劳动人民，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中，涌现了大批光彩照人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地处雪山峡谷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东旺公社新联大队，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一个老贫农，凭着一颗红心，组织了九个老人的“愚公班”，开出了全大队最大的一块

梯田，为全大队立下了榜样。在老“愚公班”的带动下，二十个青年在青石板上造出了梯田。他们的行动大大鼓舞了新联大队广大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信心。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公社也有十四个瑶族



保安族

老人组织了“老愚公组”。他们带头挖掉历来被认为动不得的“神树”，拆毁庙宇，开出了大片水田。还在现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批判了孔老二的“天命观”。在内蒙古自治区达茂联合旗新宝力格公社有不畏风寒，一心为集体，坚决保卫畜群的草原英雄小妹妹。四子王旗白音希勒大队，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光照射耀下，带领一家三代，苦战九昼夜，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上打成了第一眼水井，解决了一个畜群点的缺水问题。这位老人被当地誉为草原上的“新愚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族人民，平时为社会主义事业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一旦到了革命需要的紧急关头，有的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抢救亲人解放军，有的为了抢救集体财产，就毫不迟疑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有个名叫阿谢凯的牧民和他的女儿萨尼亚，一九七〇年夏季，有一天，在放牧羊群时，突然遇到狂风和雹雪，阿谢凯父女奋力把惊散的羊群赶在一起，用双手扒出埋在雪里的羊，脱下身上的棉衣盖在羊身上，自己穿着贴身的衬衣继续抢救羊群。等到队里其他社员赶来时，他们已冻得脸色发青。大伙劝他们赶快回去，阿谢凯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我们，救羊要紧。我们要用生命保护集体的羊群！”经过阿谢凯女性和大家的抢救，集体的羊群得救了，可是英雄的父女却牺牲了。阿谢凯父

女的生命终止了，然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却象不灭的光焰永照人间；一个阿谢凯倒下去，千万个阿谢凯跟上来。这些迸发着共产主义思想火花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是我国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精神面貌巨大变化的生动写照。事实雄辩地证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是具有远大目光和高尚道德的人民。他们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勤奋劳动直至英勇献身的崇高革命精神，是对孔老二、林彪之流“唯上智下愚不移”、“群众落后论”等无耻澜言的有力驳斥。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文化教育战线取得巨大成绩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学实验活动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迅速成长壮大，到处呈现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我国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根本谈不上进学校学文化的事。那时，许多少



裕固族

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象西藏那么大的地方，竟连一所劳动人民的学校都没有。有些地方，即使有少量的学校，也是被剥削阶级占领，当作欺骗和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创造物质财富和人类文化的农奴们，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世世代代受苦难，祖祖辈辈睁眼睛。社会主义制度为各族人民开辟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同样也享受到了渴望已久的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把学校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牧)亲自参加领导、管理、改造学校，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使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很大的发展。例如，西藏自治区，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才办起了第一所向劳动人民开门的小学。民主改革后，西藏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一九七五年，全区各类学校已有四千三百三十多所(其中包括一九七五年建立的西藏师范学院)，在校学生近二十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自治区成立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一倍半以上。中专和中学的学生，增加近十三倍。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此，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这样。

各类民族学校都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立足革命，

大胆实践,坚持开门办学,实行厂校挂钩、社校挂钩;学校本身也举办工厂或农场,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组织教学。专科以上各类院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从基层中选拔有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學生,学生学习期满后,仍然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关门读书,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状况,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培养造就了大批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网点分布不合理,某些偏远山村依然没有学校,再加上教学形式也不够灵活多样,因此,不利于适龄儿童入学,也不利于在校学生的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遵照毛主席关于“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的指示,除努力增加国家举办的小学之外,还发动广大群众因陋就简建立民办学校或实行半日制、早晚班或巡回教学,把学校办到帐篷、牧场和边远山村,使各族贫下中农(牧)子女就近入学,既有利于生产,又方便了群众,加快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是个地势高寒,气候多变,条件艰苦的纯牧区。社员帐篷分散,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不到两个人,队与队之间的距离也很远。根据这个情况,他们除国家办学之外,充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把学校办到帐篷门口,实行半牧半读,学生跟群放牧时,教师就骑马跟群教学。为了照顾生产,还采取忙时少学,闲时多学的办法,做到学习、劳动两不

误。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等地还创办了“马背牧读小学”，由教师骑马巡回教学。许多地区还因地制宜实行勤工俭学。根据自然条件和学生的年龄、体力条件，开展一些工、农、牧业生产活动，既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的优良品德，又可以为国家或集体增加财富，节约国家教育经费，减轻群众办学负担。上述措施，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牧)民的欢迎，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城镇，中学教育普及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京 族

为了更好地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普及教育的同时，还根据农村、牧区三大革命运动实际需要，创办了许多新型的学校，或在大专院校中设置各种新的专业班。在这些学校和专业班里，有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需要设置的会计、电工、农机、师范、医疗卫生、畜牧兽医、农村广播及其他专业课。这种办法能在较短的时期里，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地区急需的革命和建设人材。此外，在全国不少大专院校里，都招收了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担负着培养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人材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教育，包括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使广大农村、牧区和偏远山区都有了学校。有些在解放前还长期处在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也过上了有文化的生活。例如，解放前西藏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长期居住在深山密林之中，“刻木结绳作记

事，花开鸟语为节令”，过着没有文化的生活。现在不仅有了小学生、中学生，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他们有的当记工员或会计，有的当教师或医生，等等。他们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成绩。

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

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歌舞、戏剧等传统的艺术，被剥削阶级用来歌颂帝王将相、封建领主，成为毒害、麻醉人民的工具。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人民对各种艺术形式和传统音乐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由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坏，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革命文艺的种子在辽阔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根开花，出现了百花盛开春满园，万紫千红放异彩的繁荣景象。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个光辉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登上文艺舞台。千百年来由奴隶主、封建领主、王公、活佛、土司、头人等牛鬼蛇神统治文艺舞台的局面已经结束，工农兵英雄人物和草原儿女在文艺舞台上扬眉吐气、大显身手。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在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扬回荡，革命样板戏描写的战斗故事已在农村、牧区家喻户晓。

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少数民族的戏剧也不断进行改



塔塔尔族

革,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地方剧种,包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剧种都纷纷进行了移植革命样板戏的尝试。如新疆的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广西的壮剧《平原作战》、云南省的傣剧《沙家浜》;傣、白、景颇

等族的文艺工作者,还分别使用傣族的赞哈调、白族的大本曲和景颇音乐,试验移植了革命样板戏的一些唱段。把革命样板戏塑造的英雄人物,从京剧舞台搬上少数民族文艺舞台,从而使各族人民更加喜闻乐见,进一步普及了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把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传给群众,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

革命样板戏成为激励各族人民继续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学革命戏,做革命人”,已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越是艰险越向前”,成了鼓舞革命群众奋勇前进的战斗口号。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龙江风格”,已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了发扬。

革命样板戏,还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性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等创作活动的蓬勃发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百花齐放,涌现了许多丰富多采的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文艺节目。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话剧团的独幕话剧《主课》,广西壮族自治区京剧团的《瑶山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剧《苍山红梅》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牧骑(意即红色宣传队)演出的许多剧目,等等,都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更好地发挥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深入农村、牧区和边远山村，为工农（牧）兵服务的文艺轻骑队。内蒙古的乌兰牧骑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乌兰牧骑从一九五七年诞生以来，一直保持“队伍短小精悍，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简单轻便”的特点。以演出革命文艺节目为主，又兼搞图片展览、幻灯宣传，辅导群众业余文艺活动，还因地制宜做多种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如代售图书，代邮书信，代修钟表、收音机，以及理发、治病、接生，等等。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少数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既传播了社会主义文化，又增强了民族团结。



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兰牧骑为牧民演出

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电影放映队迅速增长。放映队员们不辞辛劳，终年奔走在山村牧区的村村寨寨。使偏僻山村里的农民，茫茫草原上的牧民和边防哨卡的

解放军指战员，能从银幕上受到社会主义教育。

合作医疗日益巩固 赤脚医生遍及村寨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解放初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就立即派出巡回医疗队，深入到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免费医治对各族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输送医务工作者，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医药卫生人员；动员群众经常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党和政府还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器材、药品，帮助建立医院、防疫站和医药商店，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顽固地推行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因此，使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农村、牧区，尤其是一些高寒山区，偏僻村寨，缺医少药的现象严重存在，再加上“鬼神”、“天命”等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毒害，神汉、巫婆骗钱害命的活动也时有发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等运动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判了“鬼神”、“天命”、“死生有命”等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思想，各族人民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以改造世界的英雄气概开展卫生革命，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族人民遵循毛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指示，创造了依靠集体力量与疾病作斗争的合作医疗制度，自力更生地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着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广大赤脚医生全心全意

为贫下中农(牧)服务,认真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实行中西医结合和勤俭办医,为不断巩固发展农村、牧区的合作医疗制度作出了成绩。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城镇医疗机构紧密配合,初步形成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农村、牧区医疗卫生网。不少社队基本上做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初步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贫下中农(牧)想想过去“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的悲惨情景;看看现在“无病早预防,有病大家帮,医药送上门,健康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务工作者,积极到农村、牧区安家落户,或者参加巡回医疗队,全心全意为广大贫下中农(牧)防病治病,内地各省市和驻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医务工作者,带着毛主席、党中央对兄弟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不断地奔赴边疆地区,为贫下中农(牧)送医送药,抢救重危病人,医治疑难杂症,协助培养医务人员,培养赤脚医生,等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牧)革命精神鼓舞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各族医务人员中,出现了许多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贫下中农(牧)服务的动人事迹。例如,战斗在帕米尔高原上,并且以身殉职的共产主义战士、汉族医生杜洪亮,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杜洪亮是新疆非金属矿公司七〇六矿的医生,自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在卫生革命中,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并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位维吾尔族的老贫农

说：“我们这里的高山，他都爬过；我们这里的冰河，他都趟过；我们的农户、毡房，他都进过。他是我们身边的医生，心上的人，他是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



独龙族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民族医药学也得到很大发展。民族医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医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有关单位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民族医药书籍，如《蒙药学》、《蒙古药学试用教材》、《维吾尔民族医常用复方制剂手册》、《西藏常用中草药手册》等等。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一些在解放前人口逐年下降的少数民族，现在人口大幅度增长，有些民族的人口成倍增长。据一九七三年统计，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比解放前增长了二点二七倍。解放前人口每年纯减千分之六点九，现在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二十二以上。西藏民主改革前的一百多年间，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而民主改革后的十五年，人口就净增了三十多万。居住在西藏察隅县的僜人，解放前被三大领主诬为“野人”，赶进深山老林。西藏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把他们从濒临灭绝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下山安家，帮助他们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免费医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口逐年增长。据一九七四年的统计，察隅的僜人比一九五〇年下山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指示照耀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级体育机构得到健全，许多地区开办了体育学

校和业余体育学校,并且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通过经常性的锻炼和比赛活动,普遍提高了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运动员的思想觉悟和运动技能。有的少数民族出身的运动员,还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国八名藏族登山运动员和一名汉族登山运动员,他们继一九六〇年我国三名登山运动员在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再次从北坡踏上了地球的最高点。特别是一名藏族女登山队员也胜利攀登顶峰。这是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女子登山运动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下,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广大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牧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展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少数民族地区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各族知识青年,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他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牧)再教育,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和贫下中农(牧)一起战天斗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进行科学实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和移风易俗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许多青年成了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的能手,科学实验的尖兵。他们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改造了思想,大批优秀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些还被选拔到各

级领导班子。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人，正在农村、牧区的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开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少数民族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解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科学工作者和国家组织的专业队伍一起，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考察，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青藏高原考察队，对宜农荒地、森林、水利开发，以及有关水稻、冬小麦、茶树等栽培的范围、品种、技术措施等，作了调查研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为青藏高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牧业生产，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立了科学实验机构，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在农业区设立了研究各种农作物的综合或专业科学试验站，在牧业区建立了良种繁育场。在农村、牧区还建立了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在一些主要河流和水利工程上，设有水文站。在盐碱土壤地区，设立了土壤试验站。在渺无人烟的大沙漠边缘和受风沙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设立了改造沙漠的治沙站。此外，还普遍地建立了气象站，等等。一支以贫下中农（牧）为主体的

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牧区。

广大贫下中农，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改土造田，治山引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革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取得农业增产的新经验。西藏广大翻身农奴和驻西藏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同西藏自治区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一起，在西藏高原试种冬小麦成功，并取得连年大面积丰收的好成绩，小面积亩产达一千六百十斤。吉林省朝鲜族的一个老贫农，通过八年多的试验，利用水稻同玉米进行远缘杂交，培育出了一种具有穗大、粒大、抗旱能力强的“玉米稻”。原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某团军垦战士，发扬南泥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断摸索棉花高产规律，在被人们认为“棉花禁区”的准葛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试种棉花成功，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九年中，全团棉花产量连年上《纲要》，其中有七年每年亩产皮棉都在一百斤以上。

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在牧业战线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广大贫下中牧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大搞群众运动，积极进行牲畜的杂交和土种选育，大大加快了改良畜种的速度。如青海省的海晏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群众性的培育杂种羊的科研活动蓬勃发展，到一九七三年，在短短七年多时间里，共育成杂种羊十五万三千多只，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时间缩短了一半，效果却提高了十四倍以上。在兽疫防治工作方面，实行群防群治，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一些严重的牲畜疫病，如口蹄疫、鼻疽病、布病等，都已被控制。

科学实验活动，推动着生产的发展，并且不断开拓着人们的思想境界，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大的自由。被压抑了千百年的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正以磅

礴的气势迸发出来。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欣欣向荣

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建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更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加蓬勃地发展。

大寨花开 山村巨变

解放以后，我国各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金光大道。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为各族人民指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少数民族广大农、牧民以大寨为榜样，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走大寨道路，学大寨榜样”的战斗口号，日益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英雄气概，为重新安排山河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到处出现千村万寨修梯田，千军万马战山川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不断地出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迅猛地向前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批粮食产量上《纲要》或过“黄河”、跨“长江”的丰产单位与丰产地区。被称

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全区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百分之七十的农田分布在海拔三千到四千一百米之间的河谷地带。那里无霜期短，气候多变，土壤条件复杂，自然灾害多，世世代代基本上没有越冬作物。这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被有的人看成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然而，打碎了封建农奴制度枷锁的百万翻身农奴，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大力开展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大面积种植冬小麦获得成功，并连续夺取大面积、大幅度增产。一九七三年全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增产，五个县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一九七四年又有几个县跨入这个先进行列，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全区三十二万克（一克相当于一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达到四百斤以上，还出现了亩产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一九七五年，全区五十七个农业县和半农半牧县，已有两个过“黄河”，八个上《纲要》，十二个县平均每人生产粮食超过千斤。这个巨大的变化，有力地驳斥了帝、修、反和达赖叛国集团诬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无耻澜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粮食生产获得连年丰收，增产的幅度不断上升。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全区增产的粮食总数超过前十六年的增产总和。这个自治区的南宁地区增产的幅度更大。一九四九年南宁地区年产粮食仅十二亿二千万斤，到一九六九年，达到二十四亿四千万斤，一九七三年，又提高到三十六亿四千多万斤。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的增长速度，等于过去二十年的增长速度。粮食的大幅度连年增产，从根本上改变了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结束了吃调进粮的历史，并且越来越多地向国家提供商

品粮。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一向比较后进。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人们形容西北那种古老落后的农业生产自然面貌是“秦朝的地块汉朝的渠，唐朝的地埂宋朝的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如今，从甘肃的河西走廊到陇东的黄土高原，从宁夏北部黄灌区到南部的干旱山区，千百万亩农田展现出一幅崭新的面貌。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不断扩大，粮食增产的幅度也逐年上升，许多地方不仅粮食自给，摘掉了“吃供应”的帽子，而且还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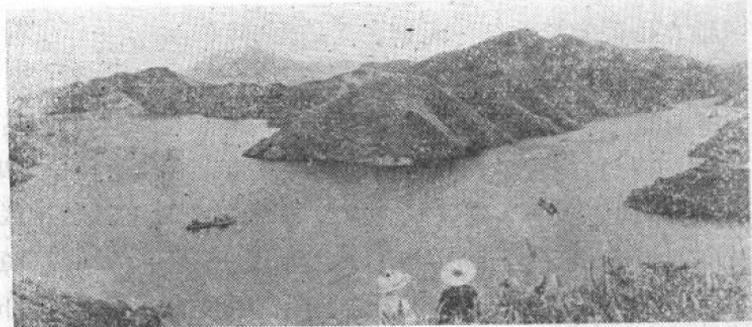
到一九七四年为止，甘肃省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县有二十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九个县、市、旗也个个增产。这个自治区第一个过“长江”的吴忠县，解放前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年年增产。一九七一年单产过“黄河”，亩产七百零八斤。一九七三年跨“长江”，亩产八百零九斤。一九七四年上九百，出现全县持续均衡增产的大好局面。一九七四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千六百万斤，是一九七〇年的四倍，比一九四九年刚解放时全县粮食产量的总和还多七百万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建国以来，依靠社会主义的集体力量开垦了大量的宜农荒地，并且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制服风沙干旱，实行科学种田，农业生产也获得连年丰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七四年的粮食产量和一九四



鄂伦春族

九年相比，增长了两倍半。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七四年在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后，农业产量还比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湘、桂、黔边界“三省坡”附近的苗、侗、瑶、汉等族群众，在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修建了一座“团结水库”，使两千多亩稻田旱涝保收。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粮、棉、油、麻、丝、茶、烟、菜、果、药、杂全面发展的大好局面。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日益增多，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也日益改善。我们可以看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公社的变化。二十多年前，这个地方的贫下中农，收到毛主席亲笔回信，毛主席在信中说，希望他们在获得土地改革胜利以后，“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现在，截至一九七三年为止，这个地处帕米尔高原下的喀什噶尔河畔的公社，已把大部分农田建成旱涝保收田。昔日贫穷荒凉的帕哈太克里，如今成为盛产水稻、



小麦、棉花及瓜果的社会主义新绿洲。仅十一、十二大队(原帕哈太克里乡)的粮食总产量就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四倍多,各种牲口增加三倍多,拥有集体果园一百六十亩、瓜田菜地二百亩,公共积累达到十三万元,储备粮三十五万斤,还添

赫哲族

置了拖拉机、电动脱粒机等许多大中型农机具,大部分土地实现了机耕。随着生产的发展,维吾尔族贫下中农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许多人家都买了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不少家庭装上了广播喇叭。公社大队有医务所,生产队有赤脚医生,百分之九十七的适龄儿童入了学,还有不少贫下中农的子女上了大学。毛主席二十多年前亲笔写下的希望,如今正在变成美好的现实。帕哈太克里的发展进步,正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草原换装 六畜兴旺

我国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有广阔的草原,是优良的天然牧场,有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就是以牧业为主的。但是,解放前,广大牧民受着牧主、王公、活佛、土司、头人的残酷压迫,还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逐水草而牧,逐水草而居,生产十分落后,生活十分困苦,畜牧业逐渐衰败。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牧民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使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克服了单一经营、靠天养畜等旧思想习惯,进一步贯彻牧区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方针,落实党的牧业政策,调动了广大牧(农)民为革命养畜的积极性,促进了牧业的新发展。

牧区广大贫下中牧，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搞植树造林、封滩育草、治沙引水的牧区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大大改变了牧区许多地方过去“黄沙滚滚半年来，一半草场沙里埋”的局面，出现了水草并茂，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发展的新面貌。在牧区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大批牧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事迹。内蒙古乌审旗乌审召公社就是全国闻名的“牧区大寨”。这个处在毛乌素沙漠中心，风沙干旱十分严重的牧区公社，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流沙，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大规模造林育草。如今，沙漠上的树木，一片连着一片，饲草饲料基地内，粮草并茂，渠水淙淙，沙漠变成绿洲，昔日荒漠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这个公社在建设草原的实践中还创造了“草库伦”的形式，为科学养畜，有计划地轮牧创造了条件。“草库伦”就是用土墙柳笆、铁丝网把一块草场围起来，在里面种植优良牧草，封滩育草，更新天然草场；栽树，建立苗圃；建设高产稳产饲料基地，种植粮草兼收作物；兴修水利，治理沙丘。这个公社星罗棋布的“草库伦”形成了一个草原建设网，把放牧、打草和饲料基地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又起到改造自然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一九七二年牲畜头数达到十万零三千头，比解放初期增长五倍多，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八。象乌审召这样的“牧区大寨”在各个牧业地区不断涌现，促进牧业生产蓬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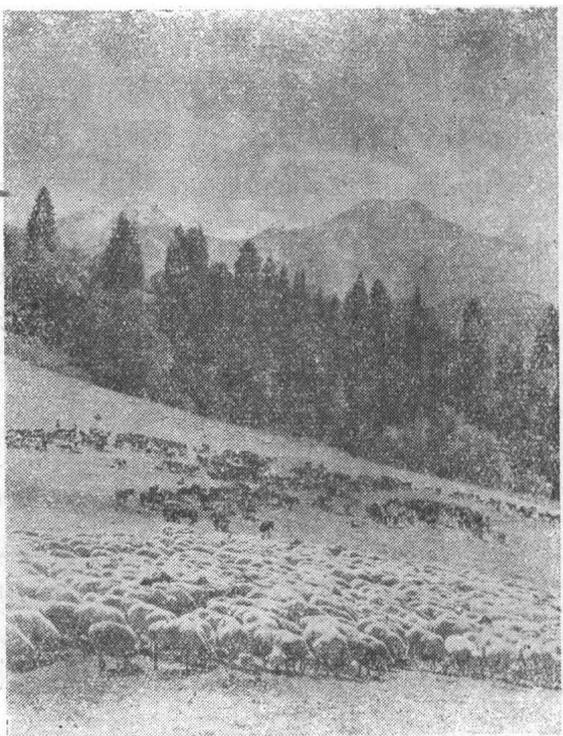
新疆牧区，在大步前进。截至一九七五年为止，牲畜的总头数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多。

青藏牧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一九七三年的统计，青海省各牧区已种植各种多年生牧草近二十万亩，建立饲草饲

料基地二十三万多亩。打井五百四十多眼，挖蓄水池三百多个，修水渠一千一百八十九条，总长一千多公里。这些水利工程，灌溉草原一百九十五万四千多亩，扩大草原利用面积四百二十万亩。草原建设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一九七二年，各类牲畜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畜牧业大寨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西藏牧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例如，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牧业公社、畜牧业大寨先进单位那曲县

红旗人民公社，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战，到一九七二年底，全社各类牲畜圈存数达到三万六千二百四十四头，比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时纯增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五，比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红星人民公社牧场

社时纯增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建立人民公社较晚的日喀则地区萨噶县加加人民公社,战胜连年自然灾害,全社牲畜也纯增百分之七十五,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在大寨精神鼓舞下,牧区人民公社大搞草原基本建设,牧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各项事业相应发展,牧民的生活也逐步改善。仍以西藏那曲县红旗人民公社为例。这个公社,现在有铁工组、木工组、缝纫组和供销社。随着生产的发展,给国家提供的畜产品越来越多。酥油、肉类等主要畜产品,年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六年中这个公社向国家交售酥油二万四千五百多斤,羊毛十三万多斤,皮子二千六百八十多张和大量的肉食和羊绒等。社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一九七二年,社员平均收入比一九六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大多数社员储备有酥油和奶渣,许多户还有存款。牧业生产的发展,给牧民们带来的生活改善,最为突出的还是定居。民主改革前,全乡只有九间房屋,全被剥削阶级占有,牧民们长期过着缺吃少穿无定居的游牧生活,一年到头只能蜷缩在破烂不堪的帐篷里。现在,依靠集体力量,修起房屋二百三十多间,绝大部分社员住进了新房,实现了定居。其他牧区,牧业人民公社,和红旗人民公社一样,随着生产的发展,也都逐步实行定居放牧。广大牧民,陆续住进了镶有玻璃的新房,从而结束了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现在,牧民放牧归来,把畜群赶进电灯通明的村落旁边的圈棚里,走进宽敞明亮的新屋休息过后,可以去生产队图书室看书看报,也可以去政治夜校学习理论、学习文化,感到无限幸福。抚今追昔,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对比解放前饥寒交迫的悲惨岁月,各族牧民满怀深情地唱道,

大海再深也有底，
草原再宽也有边，
毛主席的恩情啊，
千歌万曲唱不完。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植树造林，扩大绿化地带，能够保持水土，改良气候，促进农业和牧业的发展，还可以改善环境。同时，木材又是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材料。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要在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少数民族地区，在农、林、牧三者相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浩如烟海的天然森林资源，并且有营造人工森林的良好自然条件。可是，在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非但不提倡植树造林，对天然森林资源也恣意破坏，滥肆盗伐，再加火灾迭起，人畜践踏，许多青山变成秃岭，绿洲被沙漠侵蚀，致使水源日渐枯竭，农田、牧场荒芜。解放后，广大林业职工和农、牧民，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林业政策，为发展林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林业战线的各族职工和广大贫下中农（牧），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林业建设的罪行，坚决贯彻农、林、牧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山、水、林、田综合治理，大搞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遇到严重水旱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夺得粮食丰产，除其他条件外，林业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地处火焰山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风大、沙多、干旱，素有“火洲”和“风库”之称。当地年降雨量只有十六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三千毫米以上，夏季酷热，气温最高可达到摄氏四十七、八度。每年春夏之间还有多次八级以上的狂风，常常把田地变成沙原，把村庄荡为废墟。位于这一地区的我国历史上曾经繁华一时的汉代交河古城和唐代高昌古国，都是在风沙和干旱中沦为历史遗迹的。在神话故事中，火焰山更被描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唐代诗人岑参描写它是“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族人民，抓大事，促大干；以大干，促大变，终于把“火洲”变成了“绿洲”。被誉为“火洲大寨”的吐鲁番县五星人民公社，由于风沙干旱为害，一九六三年以前粮食一直不能自给。一九六四年，这个公社广大干部和社员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了四十万个人工，移沙填土一百万立方米，造林四千多亩，植树四百五十万株，栽成了三百多里长的防风林带和护田林带，基本上控制了风沙灾害。此外，他们还修水渠、打机井、修坎儿井，全公社七万多亩耕地，已有四万多亩建成为旱来能抗，沙来能挡，风来能防的高产稳产田。全公社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七三年粮食单产达到五百三十四斤，较一九六三年增长近一点三倍；皮棉单产一百斤，较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这个昔日风起黄沙滚的荒凉地方，如今已成稻谷飘香、牛羊成群、瓜果满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各少数民族地区还因地制宜栽种果树、薪炭林和其他经济林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以及解决群众的烧柴问题。广大社员、机关、学校、部队,在宅旁、渠旁、路旁种植各种林木。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不断改变着山区的自然面貌。过去树木稀少、气候干旱的戈壁沙滩和高原严寒地带,现在都建立起许多郁郁葱葱的防护林带或人工森林,出现了许多绿树成荫、桃李争艳的园林式的新山村和新城镇。



普米族

工业发展 交通发达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在极端反动的旧社会里,各种自然资源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严重阻碍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交通陷于极端落后的境地。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关山阻隔的拉萨,解放前,除了仅有十余人的打铁炉之外,根本没有现代工业。即使同内地联系比较方便的广西南宁,也只有印刷、火柴和水、电四家破烂的小厂,被人们形容为“一根火柴,半截烟囱”,连一根铁钉、一张草纸,都得从别地运来。其他几个地区的中心城镇,也同样如此。少数民族地区的铁路很少。公路也很少。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山川纵横,交通阻隔,人们长期以来,只好依靠一双肩膀两条腿,穿林海、“攀天梯”、“过溜索”来背运东西,传递信息。工业、交通的这种落后状况,严重地阻碍着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

和交通运输事业。解放初期，根据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国家即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交通建设投放大量资金，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事业更加一日千里地飞跃发展。

呼和浩特、南宁、拉萨、乌鲁木齐、银川等城市，建国以来，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都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如今，这些城市不但是自治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名副其实地成为自治区的经济中心。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青海省西宁市和云南省昆明市，也大规模兴建了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成为青海和云南两省各族人民的经济中心。此外，国家还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的柴达木等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规模宏伟的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石油等工业基地。这些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城市，以及国家在这些地区兴建的现代化工业企业，成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的骨干力量。

遵照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坚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现代化的大型工业企业外，还创建了基本上是土法生产的小型厂矿，如小钢铁厂、小煤窑、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机械厂等。地方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更好地为农（牧）业生产服务，而且还能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二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钢铁、煤炭、石油、电力

等现代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具有不同特点的轻工业、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工业还是一张白纸的西藏，现在在全自治区已经建立了电力、燃料、化工、机械、采矿、建筑、森林、食品、火柴、纺织、造纸、印刷、皮革、纸张等数百个中小型厂矿，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七五年全区工业总产值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将近三倍。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七四年工业总产值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二点四八倍。解放前只有几个破烂不堪的小工厂和一些手工作坊的新疆，现在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二十多倍。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如今也迅速发展起冶金、煤炭、电力、机床、化肥、农机、纺织等现代工业。我国西部的青海高原，如今工业也初具规模，煤炭、冶金、化工、石油和轻工业等都有所增长，并且已经生产出“青海湖”牌的汽车。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也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巨大变化。凉山，在解放前，莫说办工业，就是工业品也很少看到。如今，全州办起了上百座工厂和矿山，能够生产磨面机、脱粒机、粉碎机和小型发电机等。其中小型发电机，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还深受国外欢迎，现已部分出口外销。

社会主义制度在把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矿藏和各种物产开发出来的同时，也把取之不尽的水利资源逐渐利用起来，发展电力工业，为农业提供灌溉之便，为工业提供巨大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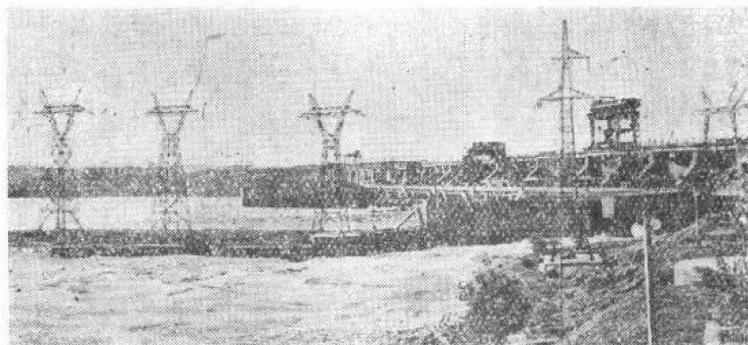
解放前，甘肃全省的发电量，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先后建立了火力发电厂和中小型水电站，特别是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发电能力更上一层楼。现在甘肃省一天的

发电量，差不多等于一九四九年这个省全年发电量的五倍。宁夏回族自治区，解放前只有一个二十多人的电灯公司，一台几十瓩的单缸煤气发电机。现在，规模巨大的青铜峡水电站早已发电。全区从平原到山区，从沙漠到草原，还有不少水力或火力发电站和变电所。全区拥有的发电装机容量比自治区成立前的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百一十九倍。高压输电线路总长达六千公里，发电量逐年增加。宁夏黄河灌区百分之九十五的生产队通了电。

此外，还有大量中、小型水电站遍布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农村和草原牧区。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以后全州新建了大量小型水电站，使全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公社用上了电。解放前从来没有见过电灯，甚至油灯也很少用的凉山彝族人民，如今满怀喜悦地用上了电灯，并且兴高采烈地办工厂、开矿山、打机井、建抽水站，等等。工农(牧)业生产如虎添翼，飞跃前进。

电力工业的大发展，促进了工业和农(牧)业的发展，过去没有工业的偏僻山村，现在有了新兴工业。许多过去是“山上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一雨便成灾，人人都发愁”的地方，如今一个个都变成了米粮川、幸福村。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平原，自从青铜峡水利工程建成以来，更如锦上添花，变得格外富饶而又美丽。

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农(牧)业机械化的进程。如今无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阔的土地上，还是在浩瀚的内蒙古草原上，甚至在苗家山寨和彝族人民聚居的凉山的梯田上，都回响着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马达的轰鸣声。在旧社会，那种骑在马上撒种子、木棍戳洞种谷子等等落后的耕作方法早已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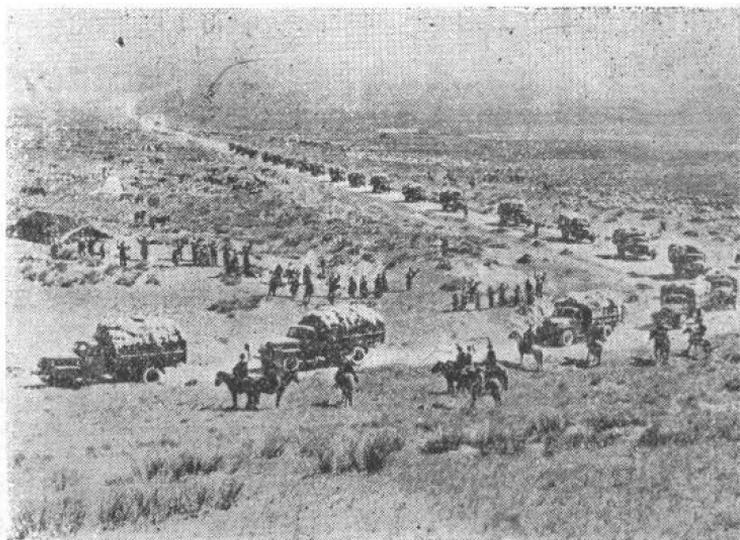
宁夏各族人民在祖国各地大力支援下建成的青铜峡水电站历史陈迹；千百年来一直靠手工操作的粮食、饲草、饲料和乳品的加工，以及打草、搂草、剪毛等工作，也逐渐被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所代替。

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解放后，国家拨付大量资金、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在少数民族地区修筑了许多铁路干线。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有铁路贯通境内，并和其他省（区）相联结。如贯穿内蒙古全境的集二线；联结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的兰青线、兰新线和包兰线；联结西南地区和中南地区的有成昆线、黔桂线、贵昆线、川黔线等。这些干线条条通向祖国的首都——北京。

公路交通更是四通八达。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只有少数破烂汽车和很少几条短程的简陋公路，多半还是时通时阻，不能正常通车。解放后，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各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指示指引下，实行国家投资筑路和发动群众自建公路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公路交通的面貌日新月异。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宁夏，全区仅有一千

余公里长的公路,将近一半的县、旗没有公路。解放以来到一九七四年为止,全区新建公路三千多公里,改建公路五百多公里,现有公路通车里程比解放初期增加三倍多。当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六盘山区,有三个县过去从来没有公路。一九六八年,三个县都通了公路,并且还和邻近省(区)沟通了联系。过去六盘山“道路险阻”、“交通梗塞”的历史,今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公路建设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西藏地区的变化尤为突出。

解放前,西藏和内地的交通阻隔十分严重。那时,从拉萨到现在四川雅安,用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严重阻碍藏族同胞和祖国内地的联系。解放后,修筑了川藏、青藏和新藏三条公路干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修筑了滇藏公路,这是加强西藏和内地联系的又一条公路干线。这些公路的建成,大大加强了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联系。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公路交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前,在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里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帝国主义和中外反动派曾经断言,西藏高原建不成公路,建成了也不能通车。但是,现在这些断言已成了历史的笑话。如今,一条条公路穿越云山雪岭,一座座桥梁横跨湍急江河,西藏已初步建成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据统计,目前全区已有公路九十一条,总长达一万五千八百多公里。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著名的江河上都架起了现代化的桥梁。这个密布在万里高原上的公路交通网,把西藏和邻近的四川、青海、云南、新疆等省(自治区)紧密联系起来。在自治区内,东起金沙江畔,西到孔雀河边,北起藏北草原,南到喜马拉雅山麓,百分之九十



行驶在青海草原的“青海湖”牌汽车，满载着当地各族牧民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羊毛

七的县和绝大部分县辖区也都通了车。

建国以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数量众多的河流，大力进行疏浚和开凿，不断延伸通航里程。水系素来发达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解放以后，以梧州为中心的内河航运日益繁荣。流经少数民族地区的黄河，在旧中国，历来都是桀骜不驯，害多利少；现在，不仅驯服地被用来发电灌溉，而且已有数处通航。向以激流险滩而著称于世的“天险”乌江、金沙江、澜沧江等著名河流，也都早已部分通航，而且通航里程逐年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事业现代化的另一标志，是民用航空事业的飞跃发展。现在从内蒙古的阿巴哈纳尔到广东的海口、湛江；从新疆的和田、伊宁、喀什到云南的保山、思茅、丽江都有民用航空飞机通航。一九五六年，我国航空人员又突破

“空中禁区”，把民航机降落到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的拉萨机场。现在从成都和兰州到达拉萨均有飞机通航。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大，地势复杂。在那些近代化交通工具暂时无法达到的地方，还因地制宜组织牛、马、骡、骆驼等畜力运输，作为现代交通运输的辅助力量。这些运输力量，穿行在海拔数千公尺的高原山区，跨越无数深川峡谷，往来于群山峻岭之中，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紧密配合，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阻隔的落后面貌。纵横交错的交通线，宛如遍布祖国全身的脉管，使边疆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和祖国的心脏——北京紧密相联，使各族人民的交往愈益密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方便条件，加强了工业和农(牧)业的相互支援，促进了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种交通线路，伸展到祖国边塞要地和各个哨所，更加强了我国的国防。

随着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我国各少数民族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迅速成长。据一九七三年的不完全统计，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等四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工人，已达四十三万多人。解放前，西藏只有为数很少的铁匠、铜匠，民主改革后，大批翻身农奴参加了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煤炭、纺织等几十种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解放前，现在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工人也没有，现在已经有了四千多名彝族工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工人，已由刚解放时的几百人发展到三万三千多人。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如今已有了一批

操纵高炉、钻塔和驾驭机器的能手。解放初期还在用木棒、石斧进行耕作的佤、傣、景颇等民族，现在也有了能够制造农业机械的技术工人。居住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畔的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赫哲族，也有了本民族的电气、建筑等技术工人。在交通运输战线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铁路职工和养护、修建公路的技术工人。成昆铁路线上就有彝、傣、纳西、阿昌、普米、傣、白、回等少数民族的近千名第一代铁路职工。西藏自治区公路部门，藏族职工已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各少数民族工人在工业、交通战线上，同汉族工人兄弟团结一起，互相学习，共同战斗，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工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一批一批地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成为工矿企业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商业繁荣 市场兴旺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有了很大发展。解放初期，党和国家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国营贸易机构，发展民族贸易，打击不法商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加强了对市场的领导，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商业占领了农

村和牧区的市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商业战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购销店、流动服务的商店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商业战线各族职工，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成立了由贫下中农(牧)代表、商业职工和基层干部参加的“三结合”贫下中农(牧)管理农村、牧区商业工作委员会。把农村、牧区的商业置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牧)监督管理之下，不断清除刘少奇、林彪的“业务第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流毒，坚持社会主义商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为工农(牧)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在商品流通领域里，发挥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积极作用。

各族商业职工，根据农村、牧区人民公社或生产队发展集体生产的实际需要，及时提供各种工具、农药、化肥、种子、饲料、粮食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帮助工业特别是直接为农业、牧业服务的地方工业组织供应各种设备和原料、材料。并经常反映产品供销和使用情况，帮助工业部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生产成本，发挥其沟通工、农(牧)业生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各族商业职工，不仅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积极做好供销工作，而且还直接参与基层的生产规划。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结合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帮助社、队因地制宜制定生产规划，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营。并且帮助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决优良牲

畜、家禽品种，解决各种经济林木的树苗和药材籽实，帮助解决饲养管理和栽培、采集、加工技术，积极扶持社、队搞好多种经营。例如，云南省是人所共知的药材之乡，商业部门的各族职工，通过认真看书学习，分清了路线是非，帮助社、队正确处理粮食和药材的关系，建立药材种植基地，做到计划、土地、种子三落实。为了提高种植技术和充分利用野生资源，商业部门还会同医药公司举办药材训练班，提高社、队种植人员、采制人员和基层收购人员的技术水平。由于各族商业职工的积极努力，全省药材种植面积和药材收购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既满足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需要，又为集体增加了资金积累，也增加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收入。

为了更好地和城乡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商业战线的各族职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搞好供销工作。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农(牧)副产品的收购和人民群众日用工业品的供应搞不好，投机倒把分子就会钻空子，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抬头。为了削弱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各族商业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收购到队，送货上门，把农副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收购上来，支援城市，支援工业，把工业品和人民生活用品包括各少数民族的特需商品，送到广大农村、牧区，支援了农牧业集体生产，方便了群众生活，堵塞了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孔道。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商业职工还同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旧传统、旧习惯作斗争。每当发现有人为婚丧喜事而铺张浪费的时候，他们就加以说服教育，劝阻那些不正当的消费，制止“四旧”歪风复活。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收入也逐年提高。特别是国家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产品规定了有利

于少数民族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价格政策。如适当提高农(牧)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适当降低某些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这就大大提高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实际收入。这种变化，仅从下列内蒙古自治区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比较表，即可见一斑。

时 间 比较项目	1949年	1966年	1971年	1972年
绵 羊	1只	1只	1只	1只
茶 砖	1.28块	6.47块	6.47块	7.1块
牛	1头	1头	1头	1头
棉 布	32.3公尺	148.9公尺	148.9公尺	186.2公尺
羊 毛	50公斤	50公斤	同左	同左
棉 布	17公尺	130.57公尺	同左	同左

生产决定流通，流通促进生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物价稳定的大好局面。农(牧)副产品收购总值，逐年上升，商品零售额也大幅度增长。各族人民喜爱的花布、条绒、绸缎、茶、糖、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等，销售额增长的幅度更大。人民的存款数额也年年增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

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更加坚定了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景颇族翻身的贫下中农说得好：“摸过夜路的人，最感灯光明亮；度过严寒的人，最觉太阳温暖；翻身农奴最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最懂得新社会的幸福。”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美好现实，鼓舞着人们沿着社会主

义大道,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进一步加深了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各族人民经常用不同的语言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独龙族人民说:“高黎贡山的映山红,靠的是阳光雨露滋润;独龙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成就,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实践,使各族人民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明的方向前进,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更加鼓舞着各族人民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以飞跃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少数民族广大干部和群众,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们说得好:“我们不能骑在马上看自己,要站在雪山顶上望全球。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要象攀登雪山那样,永远把脚印留在后面。”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它表达了各族人民万里征途不歇脚的钢铁意志。

第五章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回顾我国各族人民团结、胜利的战斗历程，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是少数民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当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夺取民族工作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在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时，只有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才不会忘记斗争的大方向和总的奋斗目标，才会自觉地注意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



瑛巴族

性质的矛盾，才不会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所迷惑，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正确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都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体现，是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处理我国民族问题上各个方面关系的准则。它不仅规定了对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正确准则，而且规定了对待少数民族内部各阶级、阶层的正确态度。民族政策贯彻得好，就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各民族中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牧）的巨大力量，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有重大的意义。是否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关系到能否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

因此，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与党的民族政策的关系，对于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有很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指出：“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的贯彻，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集中表现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使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顺利地贯彻。

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他们掩盖或否定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他们时而污蔑少数民族落后，不能搞社会主义；时而抹煞民族地区的特点，肆意破坏党的民族政策。他们的罪恶目的，是为了反对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国内被推翻了的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需

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批了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他们的干扰和破坏，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学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武器，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他们对我国，特别是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破坏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苏修新沙皇的猖狂挑衅，保卫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继续警惕苏修新沙皇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保卫我们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祖国，仍然是各族人民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还必须反对大民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在我国，大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历代汉族的剥削阶级统治者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政策。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影响却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同时，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有的也存在着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在少数民族中对国内民族关系的一种错误思想倾向。

不论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都是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民族观对立的，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必然妨碍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不利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共同前进。如果不及时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必然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动叫嚣划不清界线，容易上当受骗。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待民族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增强党的民族政策观



赫哲族民兵同边防战士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的边疆

念，自觉地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建国以来，各族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觉悟，不断地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打击了民族分裂主义，孤立了民族反动派，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这是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作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和评论《水浒》等一系列重要指示。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

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革命大团结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工农业和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

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不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共同奋斗!

后 记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是供广大青年，了解我国民族情况、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本参考读物。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单位和兄弟民族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由于我们学习得不够，理解得也不深，书中错误和缺点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给以批评指正，以便我们进一步修改。

《我国民族问题基本知识》编写组

一九七五年十月